

清代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入貢法器考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

賴依縵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

提 要

滿清帝國以「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方針，攏絡藏傳佛教高僧，羈縻蒙古部族，有清一代，優禮西藏等地區以達賴、班禪喇嘛為首的黃教格魯派僧侶，歷年輪班進貢，在清宮留下不少方物，是藏傳佛教助清廷將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納入帝國的見證。此批貢物，不少仍保留清宮紀錄，進獻者相對明確，其中，又以法器類文物承載較多歷史訊息，本文即為三十三組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出處明確法器的全面性考察。

這些法器，除了一件廓爾喀繳回文物，皆為黃教高僧大德年班朝覲、賀壽、圓寂等場合致意之禮，並涉及乾隆十三年（1748）青海塔爾寺賜御匾、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入京、乾隆五十八年（1793）廓爾喀戰爭以及咸豐二年（1852）道光皇帝葬於穆陵入廟等事。除了一套舍利藏於熱河，其餘皆珍藏於紫禁城。

根據清宮四體字籤、工藝技術與藝術風格等資訊，製作年代最早可上溯至明朝初年，最晚為晚清。而其製作地點，衛藏、康區、四川西部等地進獻法器，除了明廷賞賜舊物，皆應來自該文化區；反觀青海出身之駐京喇嘛進獻法器，則應多為京城等漢地製作。不同地域大喇嘛貢物之工藝風格與美學傳統，互有差異。其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工藝精湛法器，乾隆朝宮廷造辦處則傾力仿作，並融合傳統與最新技術，重新演繹，展現大清帝國國富民強，工藝精益求精，為泱泱上國的雄心。

關鍵詞：清代、朝覲制度、藏傳佛教藝術、法器、金屬工藝

一、前言

滿清帝國統治地域廣袤，民族多樣，以直接與間接統治，高壓與懷柔並濟政策維持帝國統一，離中心越遠地域，越需要地方菁英忠誠。¹清代沿襲前代統治邊疆民族地區的朝覲年班制度，即地方首領須定期入貢，法定節日須進表祝賀，朝覲制度不僅是外藩表示臣屬的象徵，每次覲見朝廷賞賚豐厚，藉此羈縻具有資格入貢的外藩統治菁英。²

滿清帝國以「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方針，籠絡藏傳佛教僧團，羈縻蒙古部族，³有清一代，優禮西藏等地以達賴、班禪喇嘛為首黃教格魯派僧侶，在朝覲制度下，歷年呈遞國書、輪班進貢或上表請安賀壽等，在清宮留下不少貢物，是藏傳佛教助清廷將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納入帝國的見證。⁴目前分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民族文化宮、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等地。⁵

西藏自唐代以來信奉佛教，其中黃教格魯派在明朝末年將藏傳佛教傳播到蒙古、青海等地，清代這些地區與西藏皆屬理藩院管理，皆有清廷敕封呼圖克圖駐錫。⁶其中由京派往西藏辦事之呼圖克圖，曾恩賜名號之呼圖克圖、諾們罕等，皆要隨黃教最高領袖入貢；⁷「凡朝正於京師，內札薩克王以下，各以其班至，曰年

1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著，青石譯，《乾隆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21、22。

2 John King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乾隆皇帝〈喇嘛說〉，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 340。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 343-346。

4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59-263.

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法器選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蔡玫芬，《皇權與佛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朱曉明、索文清主編，《珍寶：歷代中央政府冊封達賴班禪史料文物——歷世達賴班禪敬獻中央政府禮品精粹》(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甲央、王明星主編，《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北京：朝華出版社，2000)，冊 3、4；張宏實、徐盼巖編，《清宮秘藏：承德避暑山莊藏傳佛教文物展圖錄》(臺北：觀想文物藝術有限公司，1999)；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展》(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3)。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臺北：聯合報，2010)。

6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頁 25-26。(清)崑岡等修、吳樹梅等纂，《大清會典》(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794，頁 642-643。

7 「附前藏達賴喇嘛之使入貢者，有由京派往西藏辦事之呼圖克圖，曾恩賜名號之呼圖克圖……附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入貢者，有曾恩賜名號之諾們罕及商卓特巴一人。其實使堪布亦附貢。」請見(清)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纂，《大清會典事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99，

班。」⁸「慶賀進丹舒克，所貢銅藏佛佛像，經卷，銀滿達，銀輪，銀塔，銀瓶，銀七珍、八寶、八吉祥，銀杵，珊瑚、琥珀數珠，藏香，紅花，氍毹，藏杏，藏棗等物，亦無定數。所有辦理藏務之胡（呼）土（圖）克圖，公，扎薩克，台吉等所進各貢，附於達賴喇嘛班內，貢物俱與達賴喇嘛同。」⁹丹書克為即達賴、班禪喇嘛等呈遞之國書或賀書，在此等場合隨附各種法器如曼達盤、七政寶、八吉祥、法輪、杵、半寶石數珠及各種特色土貢等。¹⁰此外，在覲見皇帝、賀壽、謝恩等各種場合，西藏高僧亦會致禮；而高僧圓寂時，亦會請駐藏大臣等轉贈其生前供奉之佛造像、經書、成套金剛鈴杵、噶巴拉鼓及木質數珠等法器。¹¹

這些在不同場合入貢方物，造像類最受學者重視，相關專論較多；¹²而一般舉行宗教儀式使用之器具，法器類文物則鮮少受關注，早期除了朱家潛〈故宮所藏明清兩代有關西藏的文物〉，¹³多是與清廷製作文物一起考慮，一般是以圖錄論文形式論述。《清宮藏傳佛教文物》一書就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入貢及清廷製作法器做分類、入藏背景、風格特色及宗教政治意義之簡短論述；¹⁴蔡玫芬首先以〈丹舒克

頁 646。西藏是由包括衛藏在內的中部各省、東部的康區西半部、西部的阿里以及北方的羌塘四大區域組成，請參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 Fletcher），〈1800 年前後清代的亞州腹地〉，收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101。雍正年間，為分化削弱西藏，將康區東部的打箭爐、理塘、巴塘等地，劃歸四川，又將康區南部中甸等地，劃歸雲南。見牙含章，《達賴喇嘛》，頁 58。

8（清）崑岡等修，《大清會典》，頁 626。

9「每年於十一月到京，……。進貢之年，於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內，慶賀進丹舒克……。」（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5213。

10 自乾隆時期開始，文獻中將達賴等藏文請安奏書依藏文翻譯成「丹書克」。見李鳳珍，〈試論清代西藏遞丹書克制〉，《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年 1 期，頁 39。丹書克原是西藏固有的一種文書，傳遞於西藏上層貴族間，後來成為向清朝皇帝呈遞的公文、賀書，請見桑丁才仁，〈略述清代西藏丹書克的有關問題〉，《中國藏學》，1997 年 1 期，頁 77-78。但是關於此名詞的藏文音譯，仍有許多不同意見，另請見陳蓮蒂，〈丹舒克釋義——藏文補釋〉，《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輯 4（1994），頁 202-210。

11 光緒元年（1875）十二輩達賴圓寂前，囑咐將其親供佛造像三尊、金書經書三部以及「鈴杵全分、佛鼓一箇、菩提珠一串」隨哈達進獻。「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嚨呼圖阿旺班墊曲吉堅贊，當病勢彌留之際惟言，歷輩受恩深重圖報無從，諭令小的等敬備哈達一方、銅佛一尊、鈴杵一分、搖鼓一箇，呈請駐藏二位大人代為恭進。……與嘉慶二十四年（1819）掌辦商上事務第穆呼圖克圖圓寂後，前駐藏大臣代為呈進哈達、佛尊、鈴杵、搖鼓之案相符……。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5-1996），輯 116，頁 62、304。

12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故宮博物院編，《圖像與風格——故宮藏傳佛教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王家鵬主編，《藏傳佛教造像》（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展》；羅文華，〈空與幻的美：佛教造像藝術〉，收入氏著，《龍袍與袈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等。

13 朱家潛，〈故宮所藏明清兩代有關西藏的文物〉，《文物》，1959 年 7 期，頁 14-19。

14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2），頁 198。

——故宮藏傳法器來源之一〉，論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西藏入貢文物；¹⁵ 其後撰述〈皇權與佛法——清宮藏傳佛教法器研究〉，則為圖錄專論，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入貢及清宮所造法器，論其宗教、政治背景、工藝特色、清廷作坊以及西藏與清廷工藝風格之交互影響，為少數深入探討法器相關問題之論文。¹⁶ 為了〈聖地西藏〉特展，索文清與馮明珠分別撰文〈清代格魯派領袖的三次朝覲及所獻貢物〉及〈殊勝因緣——來自達賴與班禪的獻禮〉，專論藏於中國與臺灣之西藏入貢法器，以史料價值的觀點，集中討論達賴、班禪兩大喇嘛所進方物。¹⁷ 承德、北京故宮的學者則多就單一種類法器做較深入討論，時涉西藏進貢法器，如馮術林，〈清宮收藏的乾隆御制銘文古噶布拉碗〉；¹⁸ 王家鵬，〈噶布拉法器與乾隆皇帝的藏傳佛教信仰〉；¹⁹ 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²⁰ 以及李中路，〈清宮藏傳佛教噶布拉法器初探〉、〈清宮藏傳佛教法器供器概述〉。²¹ 另外於各別論文之章節或段落亦有涉及，如羅文華、吳明娣以漢藏文化交流的觀點，前者論述藏地法器對清宮此類藝術製作之影響，後者則考慮雙方之相互學習；²² Patricia Berger 則是以其如何助清帝形塑聖世明君形象的觀點出發。²³

總結而言，藏傳佛教法器相關研究，即使是年代、來源等基本問題，仍存在許多疑點。然而，入貢法器，不少拴有紀錄進獻者、甚或入藏時間的清宮籤條；國立故宮博物院相關珍藏，最初有《故宮法器選萃》披露，《皇權與佛法》圖錄則附詳細入貢者訊息，擇其精美者共十八組件討論。²⁴ 本文擬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類出處相對明確法器，無論精粗，全面考察，共計三十三組件；其中亦涉無進獻者卻

15 蔡玫芬，〈丹舒克——故宮藏傳法器來源之一〉，《故宮文物月刊》，136期（1994.7），頁4-25。

16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1-59。

17 索文收入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頁53-62。馮明珠，〈殊勝因緣——來自達賴與班禪的獻禮〉，《故宮文物月刊》，329期（2010.8），頁14-29。

18 馮術林，〈清宮收藏的乾隆御制銘文古噶布拉碗〉，《文物春秋》，2000年2期，頁54-56。

19 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264-275。

20 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6期，頁13-33。

21 李中路，〈清宮藏傳佛教噶布拉法器初探〉，《故宮學刊》，2014年1期，頁154-169；李中路，〈清宮藏傳佛教法器供器概述〉，《文物世界》，2014年4期，頁31-34。

22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下）〉，頁399-401；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北京：中國藏學，2007），頁232-240。

23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182-87。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法器選萃》；蔡玫芬，《皇權與佛法》；另有相關零星介紹，散見於特展圖錄或《故宮文物月刊》，如馮明珠，〈宗喀巴·曼達·噶布拉〉，《故宮文物月刊》，2期（1983.5），頁68-72；蔡玫芬，〈丹舒克——故宮藏傳法器來源之一〉，頁4-25。

有人藏年代籤條之文物，因為其在清宮收藏整理脈絡，應被視為入貢者相類，共涉三只金輪、四只金曼達盤，藉以觀察特定法器的風格變遷。²⁵

藏傳佛教法器向來被認為宗教意義大於藝術意涵，鮮有以工藝藝術的角度探討，在客觀條件允許下，本論擬在此脈絡，探究此批法器工藝技法與藝術風格等議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藉此嘗試更精確釐清進獻者及文物的相對製作年代；清宮籤條雖然註記某某喇嘛所進，但是在藏傳佛教轉世制度下，歷輩皆以同一名號稱呼，所涉歷史人物眾多，時代橫跨數世紀，唯有嘗試從文物本身的工藝與風格等訊息入手，或能進一步釐清製作年代之問題。此外，根據清宮籤條紀錄，可進一步探討同類文物間，因地域傳統美學或工藝技術等差異，推斷其製作區域。種種考察，期為將來更進一步理解相關問題，釐清基礎課題。舉例而言，西藏、青海大喇嘛進獻法器，即是在該地製作嗎？而若無法判斷為西藏或中原所造，又要如何闡釋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5 在位）好古而仿古所操作的歷史脈絡呢？以下依材質分別討論，其中牽涉金屬工藝之法器居多，共分兩節，第一節末釐清特定法器之四體字籤藏、漢對釋問題；木質等材質不一法器，則同置一節；最後以論述入貢法器對造辦處法器制作之影響做結。

二、金屬工藝相關法器之一：曼達盤、金剛鈴、杵與噶巴拉手鼓

（一）曼達盤

佛教密宗承繼大乘佛教重視修習供養功德的傳統，而屬於後期佛教密宗的藏傳佛教，更具體將供養規範成每日修行實踐，其中即有曼達供或稱壇城供。曼達（mandala）原意為壇城，代表諸佛集會之所，曼達盤為修行法器，象徵供養盈滿宇宙最上珍寶予本尊、上師等，可大分為兩種，一常設於供桌，較為精美，一為行者觀修所用，較為素淨。²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衛藏達賴喇嘛與拉穆吹忠、青海土觀呼圖克圖及康區理塘宣撫司等進獻四只曼達盤。

①金曼達盤（故雜 535；徑 32 公分，通高 16.5 公分；圖 1-1）鞞皮盒貼清宮

25 清宮收藏不少亦是藏地進貢，以珊瑚、蜜蠟等半寶石製作的數珠，亦控有進獻者甚或入貢時間之籤條，另文論述。

26 壇城供詳見羅伯特·比爾（Robert Beer）著，向紅茹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臺北：時報出版，2007），頁 113-114。

滿、蒙、藏、漢四體字白籤：「利益金造曼達，乃世祖皇帝時，五輩達賴喇嘛來京供于西黃寺，章嘉胡（呼）土（圖）克圖以其吉祥萬年、寰宇康寧、眾生利益故，奏聞皇上，請於內庭供奉。」（圖 1-2）即曼達盤為順治九年（1652）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བཀའ་དབང་ལྷ་བཟང་ལྷ་མཚོ་，1617-1682）進京，晉見皇帝進獻之禮，因此認看者三世章嘉國師，建議皇帝供奉於紫禁城。²⁷ 曼達盤頂面以色澤勻淨、磨切工整的各式金鑲松石，表現從四世紀佛教《阿毘達磨俱舍論》就建立的宇宙觀。中心碩大松石代表宇宙中心須彌山，其外環繞七層高度依次遞減、以切割成不同形狀松石表示之七金山，以及四大洲與兩衛星小洲，即南瞻部洲，「北廣南陬，三邊量等，其相如車」，形如梯形（圖 1-4）；東勝身洲，「形如半月」；西牛貨洲，「圓如滿月」（圖 1-5）；北俱盧洲，「形如方座」；各洲間則以代表四大洲「四財」之如意寶分隔。另有太陽、月亮（圖 1-5）、如意寶傘（圖 1-4）及尊勝幢依東、西、南、北方向莊嚴。壇城最外圍鑲有一圈代表宇宙邊界鐵圍山之圓形小松石，其外再繞以碩大圓潤之珊瑚珠或代表劫火。²⁸ 壇城周壁鑿刻纏枝番蓮，上托傘蓋、雙魚等八吉祥紋飾（圖 1-3），以及香爐、油燈、盛滿香水之螺貝、頻婆果以及鐮鉞等五妙供。周壁四方另各有一圓形金鑲松石寶相花，位於東面者尺寸最大，因曼達盤之供養以東方為前。盤內另有一圓型小環，可拴原附於此壇城之白色絲質織暗花哈達。全器細緻繁密的金屬工藝與珊瑚、松綠石等半寶石之質材與磨切，均屬上乘。為十七世紀中期文物。²⁹

②銀曼達盤（故雜 537；徑 26.5 公分，通高 6.6 公分；圖 2-1）中央凸起如臍，刻三瓣喜旋紋，其間再陰刻水上樓閣等紋飾，代表須彌山，壇面滿布陰刻八吉祥、雜寶、暗八仙、河圖、洛書等各種西藏、中土吉祥紋飾，其中葫蘆刻有漢字「大吉利」，但更多圖飾如須彌山與外側鐵圍山等處刻有無頭體藏文。矮側壁刻

27 達賴五世傳記只提及供養「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數串……羔皮、馬匹各千件為主的貢禮。」並未提及此曼達盤，其他檔案亦未記載。見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等譯，《五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 242。然而若觀察六世班禪赴京頌壽紀錄，首批進獻之禮即以「潔白哈達、銀曼達（札）」居首，八世達賴遣使賀壽之禮，亦是以哈達與銀曼達（札）居首，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頁 232、269。獻曼達盤應為不可免之慣例。此次歷史性會面經過及影響，請見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力的崛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頁 163-206。三世章嘉國師在乾隆朝負責各種佛教相關事業，包括判斷進獻文物之年代等活動，請見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83-84

28（印度）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分別世品〉，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 29，頁 83-84。

29 進一步討論詳後。

樓閣、七政寶、五妙供等紋飾，線條與紋飾有濃厚西藏風格（圖 2-3）。拴五色絲質哈達。附黃籤墨書滿、漢文：「拉穆垂（吹）中（忠）請安，恭進拴五色哈達銀滿（曼）達一個。」（圖 2-2）拉穆吹忠（ལ་མོ་ཚས་གློང་）駐西藏達孜縣拉穆寺，吹忠即護法，重要黃教喇嘛轉世，主要以其降神指認，地位重要，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改以金瓶掣籤制度，方解除其干預決定轉世靈童之弊。³⁰ 有說廓爾喀戰爭後，其恐皇帝降罪，因此十八世紀末進獻此曼達盤與一無雕飾白螺（故雜 1321，圖 3）請罪，白螺拴黃籤：「拉穆吹忠遞丹舒克，進白海螺一個。」³¹ 確實，民族文化宮藏十九世紀末九世班禪賀慈禧太后（1835-1908）壽辰、十三世達賴進曼達盤，其紋飾精緻程度都不能與此②盤相比，³² 後述十九世紀應為理塘進獻之五只曼達盤紋飾更為粗疏，一定程度反映藏區十九世紀之風尚以及經濟力，②盤應是十八世紀末，金瓶掣籤制度創建之前，拉穆吹忠仍有一定地位時所貢。而此以漢藏吉祥紋飾駁雜相混裝飾之銀盤，拉穆寺所在的衛藏並不流行，一般是在漢藏交界處製作。³³

③金曼達盤（故雜 1862；徑 12 公分；圖 4-1）有側環，盤面平整，光素無文。側壁有一圈以捲草寶相花間隔八吉祥紋，上下另有一圈連珠紋。有裂璽。器內墨書：「四刃（兩）。」側環拴黃籤兩張：「光緒十年（1884）八月初五日收，總管王得福交。金滿（曼）達一件，重四兩，係三成金。」「裏（理）塘宣撫司德讓江錯，遣土舍、大、小頭人，呈進小金滿（曼）達壹箇。之五。」（圖 4-2）。³⁴

裏塘，即理（裡）塘，位於中國四川省西部，為入康、藏戰略要地。原屬康區，然而清廷為分化西藏統治勢力，將康區東部打箭爐、理塘、巴塘等地劃歸四川管轄，但是無法泯滅屬藏傳佛教文化區域的傳統，此地每年仍向達賴喇嘛納稅。³⁵ 理塘距康定近三百公里，離成都更有一倍以上的距離，「層巒疊障，道路紆回」，

30 廖祖桂、陳慶英、周煒，〈論清朝金瓶掣籤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995 年 5 期，頁 169-172。

31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13。另有一只金剛杵，或亦為同時入貢，相關討論詳後。

32 請見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頁 184、253；朱家潛，〈故宮所藏明清兩代有關西藏的文物〉，圖 2、14；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頁 204（應為光緒二十一年所收）。

33 漢式圖案一般未流行於衛藏地區，具有此類圖案的藏式法器多造於中原或青海、甘肅等地。見 John Clarke, "A Group of Sino-Mongolian Metalwork in the Tibetan Style," *Orientalia*, vol. 23, no. 5 (May 1992): 72. 此盤深具西藏風格，應仍是藏地所造。

34 此小包內另有白籤：「十八號金滿達一件，八成金，連環重五刃（兩）。之三。」與黃籤：「金曼達共壹箇。之三。」白籤紀錄之重量與成色符合後述道光十八年（1838）所進曼達盤（故雜 1860），黃籤紀錄之編號「之三」符合白籤之編號，故可知此兩籤原同屬道光年間所進者。另有白籤一張為清宮整理記錄：「八十四號」，應為後代編號。詳見表一。

35 康區東部在十八世紀為清政府兼併，地方由世襲土司管理，受四川總督監督。詳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頁 100。

實為偏僻山區。清雍正七年（1729）置理塘宣撫司，³⁶ 當地土司、土舍地位重要，率眾進獻曼達盤之宣撫司德讓江錯，即為當地正土司，一直任職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前後。³⁷ ③曼達盤事實上是與其他四只金質曼達盤，以錦袱打成一包，清室善後委員會舊號為「餘 1235」（故雜 1858 至 1862 號，圖 4），拴有嘉慶二十二年（1817）到光緒十年（1884）年間不等的清宮黃籤；曼達盤形式、風格雷同，製作粗疏，並不常見於清宮舊藏；清廷常有將同一地區進貢文物同置一包裹的情況，此批文物應為同一區域進獻。

此五件文物同置之大包袱內，有不少錯置黃籤，經一番梳理，可尋得其原屬文物。③ a 曼達盤（故雜 1858，圖 4-3）器內壁墨書：「五刃（兩），連□（銀）環。」器內貼黃籤：「嘉慶二十四年（1819）九月二十四日收，曹進喜交。金滿踏（曼達）一件，係銀圈環。連銀圈環，共重五兩。」大包袱內另有黃籤兩張、白籤一張，目前都登記在此件文物號下。清宮籤條不僅在清宮歷經不同太監監管，改朝換代後亦經手多人，黃籤不免錯置，墨書在器物上的紀錄則較為可靠。此件壇城器內壁墨書「五兩」，可知其重量，與所結之嘉慶年間黃籤記錄符合，大包袱內一黃籤：「金滿（曼）達一件，連□□（銀環），共重五刃（兩），七成金，之一。十七號之一」重量亦與墨書符合。³⁸

③ b 曼達盤（故雜 1859，圖 4-4）器內墨書：「四刃六□（錢）」，隨附黃籤兩張：「嘉慶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二十五日收，曹進喜交。金滿（曼）達一件，係銀圈環。連環，共重四刃六錢，七成金。」另有同治十年（1871）收黃籤一張，實屬③ d 曼達盤（詳下）。③ c 曼達盤（故雜 1860，圖 4-5）器內墨書：「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廿五日收，吳交，金滿（曼）達一件，連銀圈，共重五兩。八成金。」拴黃籤：「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吳秉通交，八成金，滿（曼）達一件。連銀圈，共重五兩。之三。」③ d 曼達盤（故雜 1861，圖 4-6）器內墨書：「五刃（兩）」，所拴黃籤內容為乾隆年間所進「利益金造無量壽佛」，與曼達盤無涉。上述③ b 包內「同治十年（1871）五月初四日收，楊長春交。金滿（曼）」

36 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土歸流，廢土司置順化縣，請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14247。

37 其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左右病故，請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輯 116，頁 750。

38 包內另有黃籤：「金滿（曼）達一件，七成金，重五刃。十七號之四。」從全面性整理黃籤結果顯示，此黃籤屬③ d「故雜 1861」號。白籤：「廿三號，金滿（曼）達一件，重四刃（兩），三成金□□。之五。」根據其重量與成分，屬③「故雜 1862」號籤條。

達一件，重五兩（兩），七成金。之四。」黃籤紀錄為重五兩曼達盤，與此盤重量相同，應附於此。上述相關整理後資訊，詳見表一。

五件曼達盤皆盤面光素無文，應為觀修用。側壁皆鑿刻一圈八吉祥紋飾，有側環。年代較早的三件作品嘉慶二十二年（1817）③ b（圖 4-4）、嘉慶二十四年（1819）③ a（圖 4-3）以及道光十八年（1838）③ c（圖 4-5）金盤技法相當類似，側面雕花紋飾皆較淺、紋飾疏朗；而十九世紀下半葉同治十年（1871）③ d（圖 4-6）、光緒十年（1884）③（圖 4-1）進貢之盤形式則較為不同，③理塘宣撫司所進者紋飾類似上述三只，而③ d 以捲草文間隔八吉祥，底則另有一圈覆蓮瓣紋，但是與上述十九世紀上半葉三只曼達盤相較，③ d、③兩者皆紋飾鑿刻較深，滿飾無空隙。五只曼達盤一定程度反映了此地十九世紀百年間此類法器風格的變遷。

④銀質曼達盤（故雜 536；徑 30.3 公分，高 13.1 公分；圖 5-1）拴鮮麗五色綢，器內貼黃籤：「土觀呼圖克圖等進。二兩平重，連綢子五十兩。」另拴黃籤：「掌喇嘛印土觀呼圖克圖等，率領各寺廟喇嘛，恭祝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萬壽，叩賀天喜，呈進銀鑲嵌法輪一箇。」（圖 5-1）與①盤一樣表現複雜的佛教宇宙世界，中心鉚釘四層逐漸高起方壇代表須彌山，除了日月、四大洲、八小洲，最外圍繞鐵圍山，還表現了轉輪王七寶、滿願牛、自熟莊稼、寶鉢中五欲妙供，以及代表鹹海的起伏波濤。紋飾多鑿刻成淺浮雕，秀美精細。壇城側壁上有一圈嵌松石、珊瑚之金剛杵與寶相花裝飾，下方則有一圈覆蓮瓣，分別代表壇城外圍結界之金剛杵輪與蓮瓣輪，其間鑿刻以左右 C 形伸展莨苕紋間隔的八吉祥。（圖 5-2）

以風格而言，盤側壁西洋風格莨苕紋飾，管見未現於其他同時代藏地製作法器，然可見於清宮藏西洋人物銅胎廣瑤瑯瓶等器（圖 38）；另有應為造辦處所造清代鎏金壇城（圖 5-5），側壁同樣是以一束左右伸展 C 形捲草紋的花草葉紋間隔八吉祥。此外，④盤側壁上圈嵌寶桐花及清代壇城側壁上圈嵌寶裝飾，兩者二側捲曲的草葉流雲紋相當類似（圖 5-2、5-5）。而④盤與清代盤側壁下層皆有一圈彷彿如蟬紋之分成左右兩瓣、其間有三卷渦紋之狹長蓮瓣紋。以工藝技術而言，④盤壇面與側壁顏色有異，顯示合金成分不盡相同，兩者焊接而成，側壁合金配方及焊鍍技術，使金屬發黑，管見未現於西藏、喜馬拉雅山地區文物，但是此清代壇城以及其

他漢地文物(圖 5-3)則有類似情況。³⁹從藝術風格與技術觀察,④盤與清代曼達盤有許多相似性。事實上,④盤壇面所表現的象寶,並非駝藏式如意珠,而是採用駝寶瓶的漢地「太平有象」圖式(圖 5-6),其往後回顧及柔軟大耳的表現,與清宮盜象尊相當近似(圖 5-7)。

土觀呼圖克圖為青海佑寧寺、塔爾寺大喇嘛,為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⁴⁰京城執掌喇嘛印務處事務六世羅桑旺秋曲吉嘉措(藏文:ལྷོ་བཟང་དབང་ཕྱུག་ཚས་ཀྱི་བླ་མ་ཙཱ་མཚོ་, 1839-1894),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蒙特恩用皇家黃韁在紫禁城乘車,馳赴賀慈禧太后六十大壽。⁴¹土觀呼圖克圖駐京城,率各寺喇嘛所獻曼達盤,紋飾風格、技術與漢地文物相近,應是在對宮廷流行與新技術皆有所掌握的京城等漢地製作。

上述四只出處明確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末的曼達盤,分別是十七世紀中代表喜馬拉雅山地區藝術成就,五世達賴進獻嵌寶金曼達盤;十八世紀末體現漢藏藝術交流,拉穆吹忠進線刻銀曼達盤;十九世紀下半葉理塘宣撫司進,風格較為粗獷的鑿刻金曼達盤;及十九世紀末土觀呼圖克圖等進,應為京城所造銀淺浮雕曼達盤;四只盤風格各異,與清宮造辦處製作較多,在盤面固定立體須彌山、各大洲及七政寶、八吉祥之銅或銀鍍金曼達盤不同(圖 5-4)。⁴²而應皆為理塘地區進獻之五只鑿刻金曼達盤,則可管窺此地十九世紀百年間此類法器風格演變。

(二) 金剛鈴、金剛杵

金剛杵原是帝釋天所持武器,象徵無堅不摧的強大力量,也是佛法真理堅不可滅的象徵,在中、後期佛教密宗的根本經典《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上首菩薩金剛薩埵,即手持象徵堅固不退轉菩提心的金剛杵。⁴³約略同時期的《理趣經》系統所述金剛薩埵,手持金剛杵,亦持象徵空性智慧的金剛鈴,代表智

39 清宮所藏〈清銀鑲珠寶靈芝如意〉所附〈瑞獸雲鳳紋夔龍雙獅足銅座〉,除了鶴、鹿、蜂、猴等象徵長壽與富貴封侯等漢地常見的吉祥紋樣,底部另有商號戳記:「李寶祺」與「紋銀」,可見為漢地所做;其側壁部分泛黑表面,與此只曼達盤側壁雷同,透露使用類似的鍛焊技術。見賴依縵、張湘雯等,《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101。

40 (清)崑岡等修,《大清會典》,頁 642。

41 其入宮頌壽一個月後圓寂。(清)陳寶琛編纂,《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72、523、577。關於此次頌壽慶典之盛大,請見李鵬年,〈一人慶壽,舉國遭殃:略述慈禧的六旬慶典〉,《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 3 期,頁 32-40。

42 圖版請見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72-75;李玉珉、鍾子寅主編,《佛陀形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191-92。

43 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冊 18,頁 208c;賴富本宏、下泉全曉,《密教佛像圖典》(京都:人文書院,1994),頁 90。

慧與方便不二，此後，此種形象大為流行，金剛鈴、杵，成為又稱為「金剛」乘的佛教密宗，最具代表性的一對法器。⁴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六套金剛鈴、杵與一只金剛杵，與衛藏地區達賴喇嘛一系有關為①、②兩對；與班禪喇嘛與濟隴呼圖克圖一系有關為③、④兩套，另有拉穆吹忠進獻一只⑤金剛杵；與青海出身的章嘉呼圖克圖一系有關為⑥、⑦兩套。此七只銅鑲金金剛杵，皆為五鈷，形制大同小異。金剛杵中間為一橢圓形寶珠，左右連接二對稱八瓣蓮座，從此圓如月輪的台座，中央伸出一末端銳利的四方柱體狀中鈷，兩兩對稱的脇鈷則從摩羯魚（makara）口中吐出，與中鈷末端相接。六只金剛鈴，頂端皆為五鈷杵，柄部則鑄般若波羅蜜佛母，多以鼓腹甘露瓶為座。鈴內拴金屬製鈴舌。肩部皆有一圈數層蓮瓣，中層八蓮瓣內，有藏文或蘭札體梵文（梵：Ranjana，藏：Lan-tsha）八供養天女種子字；鈴身上下另各有一圈鑄在兩排連珠紋間之金剛杵，近肩部者橫飾、近底部者直立，其間裝飾則不盡相同。

①二、三、五世達賴喇嘛手執金剛鈴、杵（故雜 712、713；鈴高 18.2 公分，徑 10.1，杵長 14.1 公分，寬 4.6 公分；圖 6-1）鞞皮盒貼四體字白籤：「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札木素、達賴喇嘛索諾木札木素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力益鈴杵。」（圖 6-2）即為二世達賴根敦嘉措（ དགེ་འདུན་རྒྱལ་མཚོ ，1475-1542）、三世達賴索南嘉措（ 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 ，1543-1588）及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持用。金剛鈴（故雜 712）柄部佛母戴三角形八瓣蓮冠，臉型豐潤，額有白毫，頸有雲肩，以懸垂四瓣豐厚蓮瓣的寶瓶為基座。鈴身肩部鑄藏文，鈴身以一圈綴珠寶相花為飾。內壁頂端有六瓣蓮，懸掛鈴舌處鑄有小金剛杵，器壁鑄有藏文 Om、Ah、Hūm 種子字（圖 6-3）。白籤註記「噶爾馬時成造」，指其為十五世紀初年明成祖時代（1402-1424 在位）賜贈西藏高僧文物。⁴⁵

目前存世永樂款金剛鈴杵有兩套，宣德款則有三套鈴杵及一只鈴，形式多樣，但皆鑄造精良，造型莊嚴。⁴⁶ 鈴杵有五鈷、九鈷之別，下或承摩羯魚紋、草葉紋或

44 不空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冊 19，頁 610c。金剛鈴隨著時間發展，到後期佛教密宗時期也成為代表本尊的壇城，詳見羅伯特·比爾（Robert Beer）著，《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頁 121-124。

45 白籤內容於本節最後一段討論。

46 目前存世兩套永樂款金剛鈴杵分藏於西藏博物館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宣德款三套鈴杵分別藏於布達拉宮管理處、西藏博物館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一只宣德鈴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請參上海博物館編，《雪域藏珍》（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頁 129、130；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 207-209；甲央、王明星主編，《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冊 3，頁 224-226；及 <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

無紋飾；金剛鈴除了一件永樂款柄部有環者，佛母皆下承四方垂飾飄帶之寶瓶；鈴身肩部種子字，多為蘭札體梵字，但是布達拉宮管理處藏嵌寶宣德九鈷鈴則為藏文（圖 36）；鈴身多以吉祥獸間飾八大菩薩三昧耶型為主，然而西藏博物館藏宣德款五鈷鈴則是以一圈綴珠寶相花裝飾。⁴⁷

此套①金剛鈴杵，脇鈷近半圓形，底部表現出九十度轉折，接近宋、元文物，為較古的形式；⁴⁸ 其佛母寶冠為三角形牌飾冠，寶瓶幾乎隱沒，鈷部鋒刃切面爽利，及鈴內蓮瓣裝飾似北京故宮藏五鈷宣德鈴（圖 34）；⁴⁹ 鈷部摩羯魚口吐一莖捲曲外翻的豐厚葉片，內側出一鋒利勾牙，此等意趣，及鈴身鑄藏文，佛母偏方形的開臉可在嵌寶宣德九鈷鈴得見（圖 36）；而鈴身綴珠寶相花紋則同前述西藏博物館藏五鈷宣德鈴；最重要的是此套鈴杵與永、宣朝金剛鈴皆銅質精良，比例優美，雖然與宣德款鈴相似之處較多，但是永樂款鈴杵遺留實例甚鮮，被藏人理解為成祖時明廷賞賜法器，並無扞格。

某輩達賴喇嘛進②金剛鈴、杵（故雜 710、711；鈴高 16.8 公分，杵長 13.2 公分；圖 7-1）鞞皮盒貼清宮四體字籤：「達賴喇嘛恭進鈴杵。」（圖 7-2）某輩班禪喇嘛進③金剛鈴、杵（故雜 573、574；鈴高 17.2 公分，徑 9.8 公分，杵長 13.1 公分，寬 4.1 公分；圖 8-1），鞞皮盒貼四體字籤：「班臣（禪）厄（額）尔（爾）德尼恭進鈴杵。」（圖 8-2）②、③兩件形制類似，一如前述①二、三、五輩達賴喇嘛手執金剛鈴，柄部佛母戴三角形八瓣蓮冠，寶瓶以四瓣豐圓蓮瓣為飾，然而無雲肩；鈴身裝飾、藏文種子字及鈴內細部亦一如①金剛鈴；但是③班禪喇嘛所進鈴身之寶相花以法輪替代，底部一圈金剛杵與佛母正面垂直處，鑄有一羯磨金剛杵（karma vajra），鈴內器壁所鑄種子字為蘭札體梵文（圖 8-3）。然而②、③較①鈴杵鈷部，外形較橢圓，摩羯魚比例較小並形式化，是十八世紀比較常見的風格；綜上所述，兩者雖然磨泐嚴重，然而仍可觀察其形式類似。

aspx?AntiqueLanguageID=53（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47 圖版請見上海博物館編，《雪域藏珍》，頁 130。

48 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出土此類底部明顯轉折，鈷部為半球形金剛杵，塔內出土文物具有紀年者多為宋代，請見雲南省文化廳文物處等編，《大理崇聖寺三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234、235；另有下關市出土類似金剛杵，請見大理州文管所、下關市文化館，〈下關市佛圖塔實測和清理報告〉，《文物》，1986 年 7 期，頁 54，圖 9、11；其出土文物與千尋塔出土者特徵基本一致，應為元代以前所造塔，請見頁 53。此類相關文物流傳極少，並多出於後代可再開啟的佛塔塔基或天宮，因此年代難以確定，斷代問題仍須進一步研究。

49 管見只有北京故宮藏兩只永、宣鈴內蓮瓣裝飾曾有圖版發表，型式類似，請見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2），頁 175-176。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葉，西藏政治未靖，達賴喇嘛一系轉世靈童又頗受爭議，因此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在五十二年（1713）敕封班禪喇嘛為「班禪額爾得尼」，賜金印、金冊，確定其宗教地位，以期穩定人心。⁵⁰「額爾得（德）尼」為滿語珍寶之意，不少王公貴族亦有此名。值得注意的是，班禪喇嘛所進手鼓鞞皮套白籤以「班『臣』『厄』『尔』『德』尼」紀錄，與康熙御敕之名不符，造辦處所寫四體字白籤，都有一定的審訂程序，查《清實錄》，康熙朝人物有不少以「厄爾德尼」紀錄者，其後則相當罕見，此漢語轉翻滿語「珍寶」具有一定的時代性，透露③手鼓進供時間，應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頒賜金印之前，由五世班禪喇嘛羅桑耶喜（*ལྷ་བཟང་ཡེ་ཤེས་*，1663-1737）進獻。⁵¹而②鈴杵與③風格相當，年代相差應不遠，應為五世班禪之徒，七世達賴喇嘛噶桑嘉措（*བསྐལ་བཟང་རྒྱ་མཚོ་*，1708-1757）進獻。

④金剛鈴、杵一套（故雜 707、708；鈴高 13.6 公分，底徑 10.6 公分，杵長 9.8 公分；圖 9-1、圖 9-2）鞞皮盒貼四體字白籤：「濟隆（嚨）胡（呼）土（圖）克圖世世功課所持，大利益鈴杵。」（圖 9-3）金剛鈴柄部及杵銅質泛白，鑲金因長久使用，只餘部分可見，與泛白銅胎互相輝映，相當搶眼，有部分鑲金（parcel-gilt）技法的效果。金剛鈴、杵摩羯魚長鼻與下顎表現柔軟，位於脇鈷外側的顎與吐舌彷彿植物捲葉。金剛鈴般若佛母，寶冠與頸部各有一圈鏡像式仰、覆八瓣複蓮，頭繒與耳璫往外斜張，極富裝飾性，清代少見。鈴身磨泐嚴重，但仍可見其種子字與鈴身裝飾一如前述達賴喇嘛所進者。鈴內頂端鑄四瓣蓮，中有金剛杵，內壁無字。

此套鈴杵為歷代濟嚨呼圖克圖所用，此系始於第四輩拉旺曲吉堅贊（*རལ་དབང་ཚོས་ཀྱི་རྒྱལ་མཚན་*，1537-1604），前三輩皆為追認，第一輩可追溯至活動於十五世紀的曲吉堅贊（*ཚོས་ཀྱི་རྒྱལ་མཚན་*，1402-1473）。此類應是含錫量較高的泛白銅鈴杵，管見並不多見，另一件發表於吉美博物館特展圖錄之私人收藏藏系金剛杵，銅質泛白，有部分描金裝飾，年代被訂在十四世紀，或可做為訂定年代之參考；從世系及清代少見的工藝風格推斷，此套鈴杵年代最早或可追溯至十五世紀。⁵²濟嚨呼圖克圖為駐京喇嘛，

50 雍正六年（1728）又劃分其後藏轄區，與達賴喇嘛同為政教領袖，請參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頁 283。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453-454。

51 「厄尔德尼」以「尔」之正體字「爾」檢索，搜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網站，出現五十五個條目，時代多落在康熙朝，順治、雍正朝各一筆，乾隆朝兩筆。乾隆朝以降文物白籤以「班禪額爾德尼」稱呼班禪喇嘛幾成定制。

52 Nathalie Bazin, *Rituels Tibétains: Visions Secretes du Ve Dalai Lama* (Paris: Editions de la Reunion des

當被派往赴藏辦事，則可隨達賴喇嘛年班入貢，此套鈴杵可為曾任攝政協理藏務的八輩耶喜羅桑丹貝貢布（ཡེ་ཤེས་སློ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མགོན་པོ་，1760-1810）、十輩阿旺班墊曲吉堅贊（ངག་དབང་དཔལ་ལངས་ཚས་ཀྱི་བྱེད་མཚན་，1855-1886）或任達賴喇嘛正經師的十一輩噶桑丹貝卓米（བསྟན་པའི་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བློ་མེ་，1811-1854）所進。⁵³

拉穆吹忠進⑤金剛杵（故雜 1339；長 16.2 公分；圖 10），拴滿、漢文黃籤：「拉木（穆）吹準（忠）進，拴五色哈達金剛一件。」金剛杵整體意趣似二、三、五輩達賴所執金剛杵，脇鈷近半圓及其轉折，接近較古的形式；然而細節刻畫未若前者細膩爽利，尺寸稍大，修法之外亦可為陳設用。前述拉穆吹忠進獻曼達盤、白螺與此件法器所拴黃籤，皆以滿、漢文注記，形式較罕見，並分別是為進「丹舒克」與「請安」等不同目的，符合同時入貢之可能；而其與銀盤、白螺皆原藏雨花閣一小佛亭。⁵⁴ 歷史文獻並未記載拉穆吹忠具入貢資格，但是，乾隆朝中期皇帝封賞西藏可入貢之高僧大德檔案，拉穆吹忠列名在神職人員最後、俗人之前，賞賜文物亦較俗人多，透露其亦應可隨年班入貢之身分；無論前述三件文物是否同時進獻，皆應是十八世紀末金瓶掣籤制度創建之前所貢。黃籤可補史料不足。⁵⁵

章嘉呼圖克圖一系進獻⑥、⑦兩套金剛鈴杵，⑥此套（故雜 978、979；鈴高 14.5 公分，杵長 9.5 公分；圖 11-1、圖 11-4）鞞皮套貼四體字白籤：「永寧寺廟內密藏供奉，章嘉胡（呼）土（圖）克圖輩輩手內常執，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鈴杵。」白籤提及此套為「噶爾馬時成造」，即明初朝廷所賜。金剛鈴般若佛母磨泐嚴重，但仍可見佛母豐潤鵝蛋臉，額間有白毫，寶冠以繁複捲草花葉紋裝飾，近似西藏博物館藏宣德款五鈷鈴；⁵⁶ 鼓腹矮瓶以四片細橢圓葉形紋裝飾，似北京故宮藏宣德鈴（圖 34）；黝黑鈴身一如國家博物館藏宣德鈴；⁵⁷ 肩部鑄蘭札體梵文；鈴身深鑄吉祥獸，間飾蓮花、法輪與寶劍等八大菩薩之三昧耶形等，如多數的永、宣鈴。

Musees Nationaux, 2002), 136.

53 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頁 123。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頁 14549。土呷，〈昌都清代的四大呼圖克圖〉，《中國藏學》，2001 年 4 期，頁 49。妙舟編纂，《蒙藏佛教史》（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輯 2，頁 45-46。

54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輯 6，頁 12。

55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二十九日，〈八世達賴喇嘛坐床並御賜物件清單〉，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珍藏歷世達賴喇嘛檔案薈萃》（北京：宗教文化，2002），頁 174。

56 圖版請見上海博物館編，《雪域藏珍》，頁 130。

57 圖版請參：<http://www.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aspx?AntiqueLanguageID=53>（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此外，鈴內有六瓣蓮下懸鈴舌，內壁鑄兩組文字，一為蘭札體 Om、Ah、Hūm 種子字（圖 11-2），一為無法辨認之四字銘文（圖 11-3）。然而，此套鈴、杵之五鈷呈三角狀，脇鈷並非銳利鋒刃，呈扁平條狀，無武器的鋒利，相當特殊；瓔珞似繩索紋，蓮花紋幾不可辨認，鈴身紋飾比例偏大；無論銅質或做工皆粗率，不見於前述永、宣款鈴杵，實非年代相近的明代宮廷作品。章嘉呼圖克圖一世札巴俄色（ཇམ་གཤམ་པ་འོ་གཤམ་པ་，?-1641）活動於十六世紀下半葉到十七世紀上半葉，此套鈴杵製作年代不晚於此。⁵⁸

另一套⑦鈴、杵（故雜 706；鈴高 19.6 公分，底徑 10.6 公分，杵長 14.5 公分；圖 12）鞞皮盒貼四體字白籤：「章嘉胡（呼）土（圖）克圖呈進大利益銅鈴杵。」（圖 12-2）鈷部與前述②、③鈴杵類似，是清代較常見的形式。佛母寶冠、鈴身紋飾一如⑥歷代章嘉呼圖克圖所持者，但是較精緻秀氣。鈴內亦可見六瓣蓮紋下懸鈴舌，然而未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鈴身正面脇鈷、佛母寶冠中瓣、佛母鼻樑、寶瓶細葉片以及鑄成八稜的柄部中稜都在一垂直線上，傳達出工整端莊之感，也透露不同部位的造型與佈局，都經過精密思考，頗具創發巧思。三世章嘉若必多吉（རྟེན་པོ་ལྷ་མོ་，1717-1786）精通佛典之餘，亦精通梵、藏、蒙、滿、漢文，終其一生與乾隆皇帝維持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對於乾隆朝佛教文化事業影響深遠，在清宮直接參與指導法器、造像製作。⁵⁹ 此套鈴杵鑄造精良，工謹細膩，為知識淵博，精於工巧明的三世章嘉國師，依一己之審美意趣督造亦未可知。

綜上所述，①二、三、五輩達賴所執金剛鈴、杵，為十五世紀初期明初中原製作，④濟隴呼圖克圖歷輩所執鈴杵年代亦可追溯到十五世紀，⑥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者，雖然亦註記為十五世紀初中原作品，但是風格不類，依其世系，最晚年代不晚於十七世紀上半葉；②、③以及⑤鈴杵應由衛藏之七世達賴與五世班禪喇嘛以及拉穆吹忠分別在十八世紀上、下半葉所進，⑦鈴杵則應由擅長工巧明之三世章嘉國師於十八世紀所進。

上述製作年代在十五到十八世紀間的六套金剛鈴杵，可大分為兩組，衛藏地區進獻之①、②、③、④四只金剛鈴，鈴身所鑄藏字及綴珠寶相花裝飾皆同；出身青海之章嘉國師一系所進⑥、⑦鈴身則皆鑄梵字，並有吉祥獸紋裝飾。第一組四只鈴

58 星全成、陳柏萍，《藏傳佛教四大活佛系統與清朝治理蒙藏方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153。

59（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ཐུག་པོ་ལྷ་མོ་ལོ་གཤམ་པ་）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臺北：全佛文化，2004），頁 144。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下）》，頁 371-372、383。

鈴內種子字，①、②達賴喇嘛所進者皆鑄藏文，③班禪喇嘛所進者則鑄梵文，④濟隴呼圖克圖所進者無文；章嘉國師一系相關二只鈴，歷輩所執者⑥鈴內鑄梵文，⑦鈴無文。從紋飾與使用文字觀察，衛藏與青海出身喇嘛有各自不同的偏好與傳統。

(三) 噶布拉手鼓

約在九到十世紀成立的後期佛教密宗經典，開始出現本尊手持顛骨的形象，提醒生死無常的生命本質，藏傳佛教儀式用具因此不乏以顛骨製作法器。梵文「噶（嘎）布拉」（kapala）即顛骨義，一般法器以成道高僧大德骨殖所做，有手鼓、供碗以及數珠等，據信有不思議法力。⁶⁰ 手鼓，清宮依藏文稱「札嘛嚕」，為梵文 ḍamaru 音譯，此種可攜式雙面鼓多是由二個空心的半圓組成，於拱頂處相接黏合，亦有以顛骨製作者，其上罩皮；腰部常以金屬或織品箍匝，拴軟球擊鼓，並繫裝飾華麗的飄帶，⁶¹ 多為修習無上瑜珈密續所用法器。⁶² 雖然清宮所附四體字籤，藏文皆注記為「ḍamaru」，但清宮亦時以「噶布拉」手鼓稱之，指其以顛骨所製。⁶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歷代藏傳佛教高僧所進噶布拉手鼓共七件，衛藏地區與達賴喇嘛一系有關為①、②號兩只（故雜 1937、983）；班禪喇嘛一系與濟隴呼圖克圖一系有關為③、④號兩只（故雜 986、故雜 471）；駐京喇嘛章嘉呼圖克圖一系有關為⑤、⑥、⑦三只（故雜 980、571、575）。

①噶布拉手鼓（故雜 1937；鼓徑 13 公分，高 8 公分；圖 13-1）鞞皮盒內貼四體字白籤：「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劉木素、達賴喇嘛索諾木劉木素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札嘛嚕鼓。」（圖 13-2）即亦為二、三、五輩達賴喇嘛手執法器，為明廷所賜。皮質鼓面繪紺地泥金持寶飛龍，周圍滿飾纏枝蓮紋，間飾犀角、雙錢、盤長紋等雜寶（圖 13-3）。鼓面施罩一層油料，並不多見，應是為保護鼓面紋飾。鑲松石鍍金腰箍，軟球左右各一對共四只；接鑲松石大寶珠紐，繫帶穗飄帶，內層為三色緯絲，兩側則為天青色絲帛，有珍珠

60 立川武藏，〈序論〉，收在立川武藏、賴富本宏編，《チベット密教》（東京，春秋社，1999），頁 12-17。

61 羅伯特·比爾（Robert Beer），《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頁 438。

62 圖齊（Giuseppe Tucci）著，耿昇譯，《西藏宗教之旅》（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 195-196。

63 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多名此類鼓為噶布拉鼓，但亦有稱為「札嘛嚕手鼓」，「札嘛嚕」即手鼓義，兩者意義重複，「噶布拉」則傳達其以顛骨製作，「手鼓」為器物名稱，因此以下統一以噶布拉手鼓稱此類法器。

綴飾八吉祥並以之鑲邊。此類升龍紋可見於宣德年款穿蓮龍紋盤盤心；⁶⁴炯炯有神怒目，鹿角與往後飛揚眉毛、鬃毛與鬚，吻部上掀似象鼻如印度摩羯魚，背脊均勻分布三角形鬣毛，四肢關節繪兩、三谷鬃毛以及似猛禽遒勁有力鉤狀爪，皆與亦是以纏枝蓮紋裝飾的永樂年間天球瓶龍紋類似（圖 39），十五世紀下半葉以降，如成化陶瓷龍紋，已不復如此雄武矯健。鼓面龍紋具有永樂年間風格，然而有說手鼓鼓面，甚或皮套底部以鳥紋為主之紋飾，應是西藏所作；⁶⁵確實，鼓面以濃淡陰影表現富立體感、近乎滿飾的紋飾，不似傳統漢地文物，然而白籤註記為「噶爾馬時成造」，即西藏人理解此為十五世紀初明廷賜贈西藏高僧手鼓。

②噶布拉手鼓（故雜 983；全長 83.5 公分；圖 14-1）鞞皮盒（徑 15.2 公分，高 11.1 公分）貼四體字白籤：「達賴拉（喇）嘛恭進札嘛嚕鼓（鼓）」（圖 14-2）青綠鼓面描金平塗大朵蓮，環繞細長莖脈，紋飾疏朗，較北京民族文化宮藏乾隆六十年（1795）八世達賴喇嘛所進手鼓紋飾，更形式化，時代應更晚。⁶⁶淺黃色織帶腰箍，釘有鑲珍珠、珊瑚鑲金寶相花，珊瑚紐下綴織金盤長五色織帶。以織帶為飄帶之例，記年嘉慶九年（1805）濟隴呼圖克圖（圖 16-1）及前述八世達賴進手鼓皆同，應為十九世紀上半葉風尚，與鼓面紋飾風格時代相類，應為九世達賴隆朵嘉措（ལུང་རྣམས་བྱ་མཚོ་，1806-1815）甚或十世達賴楚臣嘉措（ཚུལ་ཁྱིམས་བྱ་མཚོ་，1816-1837）進。

③噶布拉手鼓（故雜 986；全長 61 公分；圖 15-2），鞞皮盒（徑 16.5 公分，高 10.4 公分）貼四體字白籤：「班臣（禪）厄（額）尔（爾）德尼恭進嘎（噶）巴拉鼓。」（圖 15-1）鼓面石青地描金穿花龍，鑲金腰箍接大松石色紐與緝米珠珊瑚色緞面雲頭，下綴珊瑚、青金石墜腳之雜色飄帶。手鼓兩面似被蓄意劃破，露出頭骨內硃書藏文經咒，但仍可見鼓面龍首佔據鼓心，昂首往上擺尾，供養裝滿寶珠供盤（圖 15-3）。龍首與龍身接續轉折清晰明確，鱗片仿①二、三、五輩達賴手執鼓龍紋鱗片（圖 13-3），以方形彩點點畫，龍身周圍滿飾以色塊圖敷纏枝蓮紋。相較於其他手鼓紋飾，此件班禪所進者還有較多二、三、五輩達賴手執手鼓風格遺緒，繪製講究。事實上，本文所討論此批法器，只有兩件文物白籤以「班臣厄尔德尼」紀錄，另一例為前述②鈴杵，兩者或為康熙五十二年（1713）前，視為一套法器，由五世班禪喇嘛羅桑耶喜（1663-1737）進獻，此鼓年代應在十八世紀上半葉。⁶⁷

64 廖寶秀，《故宮藏瓷大系——宣德之部（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圖版 2。

65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55-56。

66 朱曉明、索文清主編，《珍寶》，圖 53。

67 檔案時將金剛鈴杵與噶巴拉手鼓視為一套法器，如「十六日……三等噶布拉鼓、鈴、杵一分，

④噶布拉手鼓（故雜 471；徑 12 公分；圖 16-1），飄帶繫黃籤：「嘉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收，濟隴呼圖克圖進噶布拉鼓一件，金鑲松石腰箍，珊瑚結子一個，米珠雲頭，碎小正珠六顆，珊瑚豆六個，五色子飄帶。」即是嘉慶九年（1804）八輩濟隴呼圖克圖（1760-1810）所進。石青色鼓面光素無文，鼓沿鑲棕色皮邊，目前部分剝落。鑲金腰箍做工精緻（圖 16-2），已脫落的飄帶有緝珠緞面雲頭，五條雜色織帶有盤長結綴五色流蘇。附鞞皮盒。以上為衛藏所進四只噶布拉手鼓。

章嘉呼圖克圖一系所進，年代最早⑤噶布拉手鼓（故雜 980；長 12.2 公分，寬 12.4 公分，高 7.4 公分，全長 69 公分；圖 17-3），鞞皮盒貼四體字籤：「永寧寺廟內密藏供奉，章嘉胡（呼）土（圖）克圖輩輩手內常執大利益札嘛嚕鼓。」（圖 17-1）頭骨色澤潤澤泛黃，皮鼓鼓面罩一層保護鼓面棕色漆，一面繪烈焰熊熊法輪、一面繪放火光三瓣寶珠，此以三昧耶型裝飾，較為罕見。腰部飾捻金線織品束腰（圖 17-2），以松石色大珠為紐，緝金銀絲藏青色雲頭，下接織有八寶、雜寶之五色絲質飄帶，並帶五色半寶石墜腳。⁶⁸ 此系一世札巴俄色活動時期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上半葉，手鼓製作年代至遲應在此際。手鼓與前述歷輩章嘉國師所執鈴杵，白籤體例及內容相類，或視為一套法器，獻予皇帝。

另兩只手鼓⑥（故雜 571；長 15.6 公分，寬 13.7 公分，高 8.7 公分；圖 18-1）及⑦（故雜 575；長 13.6 公分；圖 20-1），鞞皮盒分別貼四體字白籤：「章嘉胡（呼）土（圖）克圖恭進利益噶（噶）布拉鼓。」（圖 18-2）「章嘉胡（呼）土（圖）克圖恭進札嘛嚕鼓。」（圖 20-2）⑥石青地鼓面繪穿花龍（圖 18-3），鼓沿釘有六只鑲金鑲珊瑚、松石金剛杵；有鑲松石金剛杵紋飾鑲金腰箍，接大蜜蠟珠及嵌寶鑲金三角牌飾，下拴兩兩成對五色縵帶，緝米珠及金、銀絲結間錯，穗上嵌五色半寶石。⁶⁹ ⑦石青地鼓面繪雲龍紋（圖 20-3），鑲松石鑲金腰箍，接大青金色石珠，緝銀絲藏青色雲頭，綴五色縵絲飄帶。

賞班禪尼（額）爾德呢（尼）。」（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記事錄〉）；「於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將玉噶拉布鼓、鈴、杵一分，配得鞞皮畫金套呈進，交養性殿樓上安訖。」（乾隆四十六年十月，〈記事錄〉）；「二十七日……將蘇州送到青白玉噶（噶）布拉鼓（鼓）、鈴、杵一分，玉噶（噶）布拉鼓（鼓），配金扁（鑲）松石腰箍、五色子飄帶，並鈴、杵，俱配鞞皮畫金套盛裝。」（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記事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

68 有關於捻金線的製作傳統與工藝技術，請見黃能馥，〈印染織繡工藝美術的光輝傳統（下）〉，收入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冊 7，頁 1-4。

69 盒內另有黃籤：「四層噶布拉鼓」，應指其在佛堂陳設之位置。

⑥手鼓（故雜 571）龍紋雙眼斜睜，蒜頭鼻，咧嘴貨牙，唇上下有短髭（圖 18-3）與拴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初九日造辦處呈覽青玉嘎巴拉鼓一件」穿花龍紋相當近似（故雜 472，圖 19-1、19-2），雖然筆觸較簡省。⁷⁰此只噶布拉手鼓製作年代應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左右，可為四世耶喜丹貝堅贊（ཡེ་ཤེས་དཔལ་ལྷན་རྒྱལ་མཚན་，1787-1846）所進。⑦手鼓（故雜 575），所繪龍紋似蟒，較為罕見（圖 20-3）。如蛇類呈三角形的頭部比例偏小，龍週身繚繞勾連雲紋。然而此似大蟒之龍，應是上承龍首的頸部，卻末端漸收似尾，令觀者混淆。觀察此鼓龍紋鱗片，是以勾「V」形筆觸完成，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玉質手鼓之龍紋，筆觸近似，然而比起玉質手鼓，此⑦鼓，不論龍首、身軀結組及雲紋繪製，都趨向簡省，甚或有不合邏輯之處，應是模本經過多次轉寫，工匠無法正確合理判斷圖像結構的時代，應在十九世紀以降較為合理，為四世章嘉呼圖克圖或其後轉世所進。以上為駐京章嘉呼圖克圖一系所進手鼓。

值得注意的是③班禪所進、⑤歷輩章嘉手執手鼓與清宮青玉手鼓（圖 15-2、圖 17-3、圖 19-3）皆結偏草綠色松石色大紐，仔細觀察其整齊切口，應是陶瓷燒造。在明代的基礎上，清代景德鎮各色釉瓷技術，更進一步發展，工匠以陶瓷仿造其他材質惟妙惟肖：「戩金、鏤銀、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諸作，無不以陶為之仿效。」⁷¹這些大紐，或為雍正朝創燒成功的「秋葵綠」，其與偏綠松石色澤相近，又稱「松石綠」。⁷²此應為瓷珠之二大紐，應是③、⑤手鼓入貢後，清廷所配。

而①二、三、五輩達賴喇嘛手執手鼓，其鎏金腰箍之團花、蓮花型主紋飾鑲

70 過去以為此類玉鼓為藏地所造，見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145。查清宮檔案，玉噶布拉手鼓有不少是以琢玉著名的蘇州所做，上繳造辦處後再配腰箍、飄帶等莊嚴：「於九月二十八日……並蘇州現做來送到玉噶布拉鼓二件……」（乾隆三十七年八月，〈記事錄〉）；「……七月初一日，蘇州織造全德差家人蘇赫送到青白玉噶布拉鼓三件……」（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記事錄〉）；「二十一日，……將蘇州送到……青白玉噶布拉鼓一件……」（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記事錄〉）；「二十日將蘇州送到……青玉噶布拉鼓（鼓）、鈴、杵一分……」（乾隆五十九年五月，〈記事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有班禪所進鼓面龍紋，見朱曉明、索文清主編，《珍寶》，圖 33。此與上述二鼓龍紋相當類似，或是班禪進獻後，皇帝要求造辦處仿作，而章嘉國師常駐在京，可即時掌握皇帝的品味。又⑥鼓與班禪所進鼓所拴飄帶雷同，或是供入宮中後，皇帝要求換置相同飄帶，檔案中不乏此類此類例證，例如：「十二月初二日……將交出配飄帶噶布拉鼓（鼓）一件，……旨准照第第母（穆）胡（呼）土（圖）呈進噶布拉鼓（鼓）飄帶一樣配飄帶。」（乾隆四十四年〈金玉作〉）；「四月初十日，將噶布拉鼓（鼓）四件，俱另鞞鼓（鼓）面收什（拾）見新換飄帶。」（乾隆五十八年〈金玉作〉）。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71（清）朱琰，《陶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1111，頁 257。

72 中國陶瓷史編委會，《中國陶瓷史》（臺北：胡氏圖書出版社，1985），頁 397。

天藍色松石，磨切成複蓮瓣形，松石易碎，非熟手不能為；紋飾間有細金屬絲（filigree）雙捲渦紋，上下滾邊、中脊另以連珠紋裝飾。（圖 13-4）而其嵌寶團花台座，可見焊接技術圓熟的粟米金珠（granulation），在此批法器中，只有五世達賴所進曼達盤可見相同技法。③班禪（圖 15-4）、④濟隴呼圖克圖（圖 16-2）所進手鼓，亦嵌上述打磨細緻的天藍色松石，表現金剛杵或花卉紋，主紋飾間亦有細金屬絲錁成的捲渦紋。①鼓為明廷賞賜舊物，管見未有確定是明初宮廷所做手鼓金屬腰箍可供比對，但是代表明初最高工藝技術與皇家意趣之十五世紀前期梁莊王與王妃墓出土文物，有不少包鑲寶石及細金屬絲、繫絲等精湛金屬工藝；亦有錁粟米金珠工藝，雖然在約兩百組件之金銀配飾、法器中，出現比例極低，並且並未使用在嵌寶鑲座周圍；⁷³ 其少數包鑲之綠松石，多打磨成圓形弧面；其他包鑲寶石與少數半寶石，多加工成隨形或圓形弧面、甚至依原石形態僅簡單拋磨，以拴絲鑲、爪鑲技法等固定，與①手鼓腰箍所嵌打磨細緻以膠固定的型態不同。⁷⁴ 無論如何，明廷要製作出①手鼓金屬腰箍，就工藝技術而言，並非不可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包鑲工藝金屬座之側牆，時較所鑲寶石邊緣高凸，並且不介意與所鑲寶石間縫隙較大，⁷⁵ 此種品味，在數百年後清宮乾隆五十八年（1793）玉鼓（圖 19-1）以及有乾隆年製款曼達盤（圖 40-1）皆可得見，一般喜馬拉雅山地區文物並無此特色。①手鼓腰箍年代與製作地點，筆者不敢貿然斷言，但是從其與其他西藏進獻法器金屬工藝的共通特色，偏向考慮或為五世達賴喇嘛時代西藏重裝。此外，達賴進獻②手鼓腰箍雖為織帶，但其上釘鑲半寶石鑲金座，製作細膩，品味與工藝與上述衛藏進獻手鼓一脈相承。

而三只駐京章嘉呼圖克圖一系所進手鼓腰箍，意趣則不盡相同。⑤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所執手鼓，鼓面繪獨特的三昧耶型，束腰為游牧民族酷愛的捻金線織品（圖 17-2）；⑥手鼓腰箍（圖 18-1），則與兩只應為造辦處做玉鼓腰箍風格相當類似，所

73 梁莊王與王妃分別亡於正統六年（1441）與景泰二年（1451），請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鍾祥市博物館編，《梁莊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5；金鳳髮簪，鳳鳥身軀輪廓線內滿飾粟米珠，請見前引書，下冊，彩版 118、119。清晰圖版請見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ed.,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4), 75. 中原工匠在西漢時使用焊粟米珠工藝，六朝大為風行，唐、宋亦可見相關技法，但是到明代逐漸式微。詳見 Emma Bunker,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Julia M. White and Emma Bunker,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Denver Art Museum, 1994), 46.

7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鍾祥市博物館編，《梁莊王墓（上）》，頁 326-327。

75 請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鍾祥市博物館編，《梁莊王墓》，上冊，頁 326；下冊，彩版 156 等。

嵌松石皆偏綠，體積碩大、無進一步細緻磨刻（圖 19-1、圖 37）；⑦手鼓腰箍則滿飾模切數道刻痕的松石毬路紋及葉形紋飾（圖 20-4）。總結而言，無論年代，西藏進獻手鼓腰箍半寶石打磨細緻、金屬細工上乘，嵌寶主紋飾與金屬細絲紋飾間錯交飾，主從有別，舒朗有致，同時展現半寶石與金屬工藝之美。反觀章嘉呼圖克圖一系進獻手鼓，以表現鑲嵌松石尺寸之大或數量之多取勝，注重表現物料價值，並且如前所論，與京城成造文物較類似。⁷⁶ 西藏、青海出身駐京兩地大喇嘛進獻手鼓風格不同，確有地域之別。

（四）清宮四體字白籤相關問題

1. 噶爾馬時成造：karma gan ཀར་ཀམ་གན་

二、三、五輩達賴喇嘛手執金剛鈴杵、手鼓鞞皮盒內分別貼有「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札木素、達賴喇嘛索諾木札木素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鈴杵。」與「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劄木素、達賴喇嘛索諾木劄木素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札嘛嚕鼓。」四體字白籤，過去與藏文對釋，將其理解為二套法器曾受「噶瑪派法師 Gam-dril-ra-log 加持」（圖 1-2、圖 6-2）。⁷⁷ 但是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雖然在蒙古汗王支持下，取代噶瑪（Karma）噶舉派成為衛藏地區主要宗教勢力，然而仍有與此派交好的勢力不服統治，造成兵亂；⁷⁸ 甚至在十八世紀，乾隆皇帝即位前，格魯派仍需要與其他教派競爭在清廷的影響力，將標榜被噶瑪派法師加持的法器贈與皇帝，無疑自貶黃教，實說不通。⁷⁹

兩張白籤內容，幾乎雷同，只有最後一句相異，金剛鈴杵白籤藏文為「karma gan dril ra log byin rlabs can ཀར་ཀམ་གན་དྷིལ་རལ་ལྷིན་རླབས་ཅན་」對應漢譯之「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鈴杵」，手鼓白籤藏文為「karma gan ḍamaru ra log byin rlabs can ཀར་ཀམ་གན་ཏཱ་མ་རུ་རལ་ལྷིན་རླབས་ཅན་」，對應漢譯之「噶爾馬時成造之大利益札嘛嚕鼓」。前述翻譯「噶瑪派法師 Gam-dril-ra-log 加持」即出自此句。但是過去翻譯轉寫之「gam」為「gan」之誤；

76 值得一提的是，出身青海佑寧寺的章嘉呼圖克圖自二世開始為駐京喇嘛，駐錫嵩祝寺，返回青海或入藏學習都需要皇帝特別批准。若與現藏青海已發表文物相比，清宮所藏章嘉國師一系進獻文物較為精美，請參青海省博物館、青海民族博物館編著，《河湟藏珍：藏傳佛教文物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198、199、214。

77 蔡玫芬，〈丹舒克——故宮藏傳法器來源之一〉，頁 20；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9。

78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藏學，2010），頁 112-113。

79 （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མུ་བཀའ་རྒྱལ་བཟང་ཚལ་གྱི་ཉེ་མ་），《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 148。

「byin rlabs can」為加持或受祝福，「Karma」可翻譯為噶瑪派。問題的焦點，在金剛鈴杵白籤出現的「法師」名是「gan dril ra log」，但是在手鼓白籤是「gan ḍamaru ra log」，兩者不同，難道是由不同法師加持？手鼓白籤藏文原文「ḍamaru ཏ་མ་རུ་」的「ḍa」反寫，透露此單字是梵音直寫，為梵文「ḍamaru」手鼓義，指出此句指涉法器名稱，並非人名。

明成祖自永樂五年（1407）起，曾三次邀請噶瑪噶舉派第五世噶瑪巴（ཀུལ་པ་ Karma-pa）德新謝巴（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1340-1415）赴京城，每次皆賞賜無數，藏文「karma gan（ཀུལ་གན་）」指此三次贈禮之集合名詞，「karma gan dril（ཀུལ་གན་དྲིལ་）」為此批贈禮中之鈴。⁸⁰ 手鼓白籤藏文「karma gan ḍamaru（ཀུལ་གན་ཏ་མ་རུ་）」即指此批贈禮中手鼓。⁸¹ 七世達賴喇嘛曾將「五世達賴畫像……手鈴、手鼓等一套法器」贈與赴藏辦事之三世章嘉國師，此二套法器，或即為此記錄中之「手鈴、手鼓」，其後由國師轉贈乾隆皇帝。⁸²

2. 永寧寺：ཡུང་ནིང་མི་

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鈴杵與手鼓鞞皮盒貼四體字白籤，皆提及其為：「永寧寺廟內密藏供奉」（圖 17-1），過去認為「永寧寺」即為章嘉呼圖克圖祖寺青海「佑寧寺」轉寫，⁸³ 但是其對應之藏文為「ཡུང་ནིང་མི་」為「永寧寺」漢文音譯，而並非佑寧寺藏名「郭隆彌勒洲」「dGon lung byams pa gling གོན་ཡུང་བྱམས་པ་གླིང་」之音譯「郭隆

80 法鈴尺寸有大中小三種，請見東噶·洛桑赤列（དང་དཀར་སྐོབ་བཟང་འབྲིན་ལས་པ་），《東噶大辭典（དང་དཀར་ཆེག་མཛོད་ཆེན་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頁 25、26。感謝牛津大學 Karma Phuntsho 博士、Kalsang Gyatso 大德對相關問題之翻譯。

81 鈴與手鼓藏文後加「ra log」為「鈴」之意，堪布 Karma Phuntsho 博士、Kalsang Gyatso 大德皆以為在此文義不通，尤其是「ḍamaru」後所加者。然而，以上藏文相關翻譯、解釋，若有錯誤，皆是筆者之責。又，永樂年間明廷亦曾賜黃教格魯派法器，〈宗喀巴復明成祖書〉提到皇帝賞賜黃教創教祖師宗喀巴（ཙང་ཁ་པ་）「金剛杵及銅鈴各兩份」，見陳楠，〈關於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補證〉，《中國藏學》，69 期（2005），頁 36。另永樂十五年（1417）「烏思藏大國師釋迦也失遣人貢馬，賜佛像、法器、綵幣等物。」永樂十七年（1419）十月「遣中官楊三保等費勅往賜烏思藏……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釋迦也失（失）等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綵幣表裏有差，蓋答其遣使朝貢之誠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頁 1981、2162。釋迦也失為宗喀巴大弟子，透露黃教亦曾於永樂朝被賜贈法器。

82 參（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ཐུག་བཀའ་སྐོབ་བཟང་ཚལ་ཉི་མ་）著，《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 193。雖然在正文中蔡攻芬認為此為五世達賴進獻之禮，然而在註釋則認為此套鈴杵及噶布拉手鼓亦可能是三世章嘉所進，見蔡攻芬，《皇權與佛法》，頁 9。如果考慮文物所附清宮白籤內容，此兩套文物與歷輩章嘉手執金剛鈴杵、手鼓之白籤近似，皆是破題即述所駐錫之寺廟，再述手執者；反觀前述五世達賴喇嘛進獻順治皇帝之金曼達盤白籤，則以東行歷史破題，再述其經過章嘉國師認看後供奉於紫禁城的歷史，因此筆者傾向認為此套珍貴金剛鈴杵、手鼓為三世章嘉國師進獻。

83 蔡攻芬，《皇權與佛法》，頁 140。

寺」，因此，此寺應指暢春園內永寧寺。⁸⁴ 康熙帝常駐蹕暢春園，自康熙朝始，永寧寺即地位重要，直至乾隆年間，永寧寺仍是皇帝定期活動、地位特殊的京城藏傳佛教寺院，⁸⁵ 並且最晚在雍正、乾隆年間即有駐錫造佛喇嘛。⁸⁶

二世章嘉呼圖克圖阿旺羅桑卻丹（བཀའ་དབང་ལྷོ་བཟང་ཚལ་ལྷན་，1642-1714）康熙四十五年（1706）受封為清朝唯一「國師」，常駐京城，與皇帝、諸皇子頗有往來。⁸⁷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皇帝決定建寺贈與二世章嘉國師，隔年命名為嵩祝寺，成為歷世章嘉呼圖克圖駐錫寺院。⁸⁸ 永寧寺或是皇帝駐蹕暢春園時，二世章嘉呼圖克圖就近陪伴駐錫之地，又因此寺與皇家深厚關係，得以供奉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法器。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為攏絡蒙古貴族、鞏固北方邊防，始建於康熙三十年（1691）的內蒙古多倫地區匯宗寺，三十九年（1700）當康熙帝親臨捻香，對該寺建築宏偉，但缺乏陳設莊嚴感到惋惜，下令「著爾等照暢春園永寧寺所供之例，造辦一份……。」另外對於所供造像，亦下令其大殿供奉羅漢、天王等「著照永寧寺畫像繪製懸掛……。」⁸⁹ 章嘉國師統管漠南蒙古宗教事務，至晚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中，二世即任匯宗寺第一任住持。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鈴杵、手鼓白籤，記載法器曾供奉於匯宗寺陳設之祖的京城永寧寺，進一步透露此寺的重要性。⁹⁰

三、金屬工藝相關法器之二：法輪與容器類法器

（一）法輪

84 (清)于敏中，《欽定日下舊聞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98，頁232），卷78，〈國朝苑囿〉。

85 此寺每月朝廷配有供素菜銀兩；另雍正六年（1728）皇帝下令，佛誕日永寧寺另演戲一日，以後每年以此為例。至乾隆年間，永寧寺仍維持佛誕日唯二演戲酬佛寺廟，皇帝擇一處觀戲。請見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4），頁426-428。（清）托津等奉敕纂修，《大清會典》（嘉慶朝），清嘉慶年間刻本，卷74，頁13。搜尋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81^1655310398^806^^30206076@@869846368>（檢索日期：2016年11月1日）。

86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下）》，頁362、591。

87 鄧建新，《章嘉呼圖克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0），頁16-41；羅文華，《龍袍與袈裟（下）》，頁345。

88 妙舟編纂，《蒙藏佛教史》，頁94。

89 〈內務府奏銷檔〉：118[Z]，原件系滿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郭美蘭，〈康熙帝與多倫諾爾匯宗寺〉，《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6卷3期（2004.5），頁62。

90 郭美蘭，〈康熙帝與多倫諾爾匯宗寺〉，頁63-64。

藏傳佛教時在佛龕前陳設具有吉祥寓意的法器，其中包括象徵佛陀法輪常轉、佛法常住的法輪。①銅鑲金法輪一只（故雜 1846；高 32.4 公分，重 2234 公克；圖 21-1），轂中心鑲珊瑚，外圍及輪心外輪輻鑲松石，其外有浮雕寶珠狀蒸騰烈焰，由一莖捲草承托，插入內有厚膠的台座。輪與承托皆是以二金片焊接而成。台座細長覆蓮瓣，其上有四組代表蓮子的成群半圓突起。座底內黏黃籤：「達賴喇嘛恭請聖安，呈進金法輪一個。」據此可知為某輩達賴所進。

此件文物另附有黃籤七張，牽涉到的文物皆為金法輪，其一：「金輪一件，連膠胎，共重五十兩。之一。」其二：「金輪一件，重五十兩，連膠胎。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九日收，楊長春交。」其三：「金輪（輪）一件，重廿三兩，八成金。之二。」其四：「道光二年（1822）二月二十五日收，曾進喜交，金輪（輪）一件，重廿三兩，八成（金）。之三。」⁹¹其五：「二號。」其六：「金輪一件，連木胎、銀底座，共重廿八兩，輪係七成金。之三。」；其七：「金輪（輪）一件，連木胎、艮（銀）底座，共重廿八兩，係七成金。道光二年（1822）四月初六收，曹進喜交。」七張黃籤一共出現三個號碼，應為後代，將歷來進貢形制類似的三件法輪置放一起，因此混雜。然而，將指涉相同重量、成色之金輪排比，可推斷第一、二張指涉一只同治五年（1866）收，重五十兩（1850 克）金法輪，清宮編號為一號；第三、四張則指涉一只道光二年（1822）二月收，重二十三兩（862.5 克），八成金的法輪，編號為二號，而第五張「二號」亦可歸屬此件；最後，第六、七張則指涉一只道光二年（1822）四月收，重二十八兩（1050 克）、木胎銀底，七成金之法輪。

查與此件①金輪同屬清室善後委員會原編號「餘 1235-23」之金鑲松石輪共有四件，④為一件單獨包裝（故雜 1849；高 31.6 公分，重 875 克；圖 21-4）。底有墨書：「□三兩五分」，有黃籤：「八成金鑲輪一件，銀托座破壞，共重二十三兩五錢（881 克）。嘉慶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八日收，曹進喜交。」「金鑲松石輪一件，銀托座破壞，共重廿三兩五分。之四」。白籤：「十六號，金鑲松石輪一件，銀托座破壞，共重廿三兩五分。」另兩件與①同置一包，分別為②（故雜 1847；高 29.5 公分，重 788 公克；圖 21-2）以及③（故雜 1848，高 32.4 公分，重 1029 公克，圖 21-3）。前述第一、二張黃籤紀錄該只金輪重量為「五十兩」，較其他兩件重逾兩倍，達賴喇嘛所進①金輪（故雜 1846），因座底灌注膠胎，相當沉，為其他兩件重

91 第四張黃籤註記為之「三」應為「二」之筆誤。

量兩倍以上，因此第一、二張黃籤應原屬此①金輪，⁹²為「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九日收」，是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འཇིན་ལས་བླ་མ་ཚོ་，1857-1875）按例遣使入貢之禮。⁹³而其他兩件文物，依據其重量可推斷上述三、四、五張黃籤屬②金輪，第六、七張黃籤屬③金輪，因此，兩者所收年代俱為道光二年（1822），而後者為銀底座，亦符合黃籤紀錄（相關訊息整理請見表二）。⁹⁴

同治五年（1866）收①金輪其上蓮子成群半圓突起（圖 21-1），與北京民族文化宮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達賴喇嘛所進金輪蓮座雷同。⁹⁵十九世紀上半葉進獻的②、③、④金輪（圖 21-2 ~ 圖 21-4）台座則飾肥短覆蓮瓣，座底更有一、二道出稜；此三只金輪，寶珠火焰紋、輪轂等紋飾，較①立體細緻，柔軟富有生氣。道光二年（1822）收③與嘉慶十八年（1813）收④金輪托座皆為銀胎，蓮座為仰、覆蓮瓣構成的雙層台座，惟④鑿刻線條俐落，嵌上乘天藍色松石。②、③與④金輪風格較似，亦印證②、③應為上距嘉慶十八年（1813），只有十年的道光二年（1822）所收。此四只金法輪不論紋飾、製作技法皆雷同，只是精粗有別，應皆為衛藏地區所進，然而其他三只金法輪黃籤逸失，無法確認其來源，但是根據其年代記錄，亦可見其地十九世紀前、後半葉此類法器風格變化。

（二）噶巴拉碗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慶祝七十大壽，六世班禪喇嘛羅桑班墊耶喜（སྐུ་བཟང་དཔལ་ལྷན་ཡེ་ཤེས་，1738-1780）自西藏赴京為乾隆頌壽，但是入京二個月後即出痘圓寂，皇帝與王公貴族哀痛逾恆，佈施無數，皆隨六世班禪遺體回藏。⁹⁶但是班禪兄札什倫布寺管家大強佐，未將皇帝與王公貴族之賞賚依飭公平分配，造成其為噶瑪派活佛之兄引善戰廓爾喀人入侵西藏，搶奪班禪駐錫地札什倫布寺等處，因此爆發十全武功最後一役，第二次廓爾喀戰爭，乾隆五十七年（1793）福康安（1754-1796）等出兵平定。⁹⁷此際掌辦商上事務攝政八輩濟隴呼圖克圖，因籌辦軍務有功，蒙

92 雖然清宮記錄重五十兩（1850 克）與實際重量 2234 克不盡相符，但是如後述，其他兩件重量及前述金曼達盤重量亦有出入。

93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頁 162。

94 ②故雜 1847 號金輪，重 788 克，與黃籤「23 兩（862.5 克）」重量較近似；③故雜 1848 號重 1029 克，與黃籤「28 兩（1050 克）」重量較近似；其誤差值除了與誤差有關，亦有可能是當年所黏底座膠胎剝落所致。

95 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頁 185。

96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頁 133-143。

97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 445-475。

皇帝頒「慧通禪師」法號，即進〈古德噶布拉供碗〉（故雜 1973；長 17.2 公分，寬 13.6 公分，碗高 8.2 公分；圖 22-1）。⁹⁸ 噶布拉供碗即以顛骨所做碗，多用於無上瑜珈密續儀式，⁹⁹ 此件顛骨前側與右側隱約有藏文「阿」、「吽」字，可謂得道象徵，因此將此聖物進呈皇帝。顛骨碗鑲金裏，有鑿痕，內填應為藏紅花之藏藥。配蓋與托座。

金蓋鑿刻八吉祥與纏枝蓮紋，蓋紐為鑲珊瑚、松石、青金石三瓣放光寶珠。束腰托座下承〈刻西番古德噶布拉贊盤〉（故雜 1974；長 18 公分，寬 17.1，高 8.5 公分；圖 22-2 ~ 圖 22-4），皆飾纏枝蓮紋，托座束腰鐫三只頭顛，並鑲一圈松石。中空托座內底墨書：「共重九十四兩五錢九分。」外底刻滿、蒙（圖 22-2）贊盤落槽處刻藏、漢文合成四樣字：「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十二日，駐藏濟隴呼圖克圖恭進。」（圖 22-3）據此可知是八輩濟隴呼圖克圖所進。贊盤底另有四體字乾隆御製詩贊：「西番古德噶布拉（注見前，供養器也）贊。西番古德，閱百餘世，凡身既棄，聖蹟仍示。曰：「阿（番文本 ཨུ།）」、曰：「吽（番文本 ཧུ།）」，隱現二字（西藏濟隴呼圖克圖所進古德噶布拉一具，隱隱有文，現出如「阿」、「吽」二字，非人工所作，惟深得祕密正道者，方能有是異蹟）。「阿」寂靜源，「吽」安樂義，有為無為，色空非二，作是供養，允第一諦。」（圖 22-4）原附五色、白色哈達各一方，另一紅巾內包有錘鏢八吉祥紋飾之金、銀扣各一式八件。

然而既是西藏進獻，為何贊盤底部刻有乾隆御製詩？查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皇帝即令造辦處金玉作，為此供碗做金質蓋、座配件，但初步要先畫稿樣呈覽：「初六日，……太監鄂魯裡交廂（鑲）銀裡噶布拉碗一件，隨銀鍍金碗蓋一件、骷髏頭三角座一件、濟隴胡（呼）土（圖）克圖進。傳旨另配金座蓋一分，其碗裡亦另廂（鑲）金碗裡，先呈樣。欽此。」約一週後，稿樣呈進：「於九月十四日，將噶（噶）布拉碗一件，配得合牌碗蓋樣，骷髏頭腰元（圖）座樣、半元（圖）座樣，並請領內庭八成金九十兩，繕寫摺片一件，交太監厄勒裡呈覽。奉旨，碗蓋、座俱照樣准做，其應用之金准向趙進忠要用，得（得）時將腰元（圖）座底板上，刻滿、漢字說語；半元（圖）座面板上落槽處，刻西番、蒙古字說語，其半元（圖）座底板上，刻四樣字說語，交軍機寫樣

98（清）慶桂監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頁 774。此役後，皇帝另賜莊園予濟隴呼圖克圖，早在五十七年（1793）二月，已與班禪喇嘛進獻佛造像與哈達謝恩。詳見索文清、郭美蘭主編，《清宮珍藏歷世班禪喇嘛檔案薈萃》（北京：宗教文化，2002），頁 252-253。

99 圖齊著，《西藏宗教之旅》，頁 195-196。

呈覽。欽此。」¹⁰⁰ 即畫樣得皇帝許可，並同意請領八成金九十兩製作，據此可知，此套供碗配件用八成金造。皇帝並要求刻寫四字樣。

歷時三個月，此套配件隔年正月完成：「於五十九年（1794）正月二十三日，將嘎（噶）布拉碗一件，廂（鑲）得金裡，配得金蓋、腰元（圓）座、半元（圓）座，隨換下銀裡、蓋、座呈進。奉旨將嘎（噶）布拉碗交凝暉堂，俟進宮時呈覽，換下銀裡、蓋、座歸入，交出鎔化，內呈造供器用。欽此。（此項歸入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二十八日，毀造塔用訖。）」¹⁰¹ 即成品經皇帝認可，供奉於建福宮凝暉堂。其後另配有鞞皮畫金套，內貼四樣字白綾籤，此套今不存。¹⁰² 幸而在十八世紀末以後，噶布拉碗被移置養心殿供奉，逃過民國初年在建福宮大火中被燒毀的命運。

（三）蓋罐

〈鑲金銀胎內填瑠瑯嵌寶蓋罐〉（圖 23-1）貯八成滿仍散發幽香藏紅花，鞞皮盒貼四體字白籤：「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初二日，皇上賜班禪額爾德呢（尼）丹書克，回進嵌寶石金胎綠瑠瑯蓋罐一件，內貯藏紅花。」（圖 23-2）此罐即是六世班禪喇嘛赴京為皇帝賀壽之行，於熱河，皇帝賜國書後之回禮，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此行最早進獻文物。¹⁰³ 銀、銅合金胎鑲金瑠瑯蓋罐，下承托與座。蓋紐為花苞形，蓋心為瓣內以一莖小花裝飾的盛開花朵，其外圍繞一圈五瓣花。罐身則以每行三朵、共十行整齊排列之五瓣花裝飾，每行花朵間再以纏枝葉文相連。托座以莖部有左右對稱葉片的四瓣花卉裝飾。花朵之花心、花瓣皆嵌紅寶石，與滿飾全器的清亮內填瑠瑯綠地輝映；¹⁰⁴ 蓋與托座另以釉彩閃亮的透明藍色、不透明草綠色瑠

10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4，〈金玉作〉，頁 26。

10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4，〈金玉作〉，頁 26。

102 鞞皮畫金套相關資訊：「初二日，員外郎大達塞（色）庫掌舒興催長恆善來說，太監鄂魯裡交廂（鑲）金裡嘎（噶）布拉碗一件，隨金蓋金腰圓座、半圓托座，濟隴呼圖克圖進，凝暉堂有地方，傳旨配鞞皮畫金套盛裝。欽此。於本日將廂（鑲）金裡嘎（噶）布拉碗一件，隨金座蓋配得鞞皮畫金套樣呈覽，奉旨照樣准做，寫四樣字白綾籤，將碗先交圓（原）處安供。欽此。」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4，〈油作〉，頁 459。

103 王曉晶，《六世班禪進京史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頁 241。查班禪賀壽遞丹書克進單，並未有此蓋罐記錄，然有「藏紅花一匣」，此罐即貯有藏紅花。請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頁 258-259。秦鳳京，〈六世班禪親見乾隆帝貢品史論〉，收入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3。

104 感謝本院陳東和博士檢測結果，詳見賴依縵、張湘雯等，《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頁 50。

瑯點繪增飾。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館長許曉東教授〈清宮舊藏印度珍寶〉一文，認為造辦處〈記事錄〉記載班禪喇嘛此行所進之〈嵌紅綠玻璃松石墊子金累絲廂海螺賁巴壺〉、〈嵌紅綠玻璃墊子金胎綠瑯蓋罐〉、〈嵌紅藍玻璃墊子金胎綠瑯靶碗〉、〈瑯瑯鑲嵌海螺〉四件文物，除了第一件今不知所蹤的〈賁巴壺〉不論，其他三件作品皆應來自印度，為蒙兀兒王朝的傑作；¹⁰⁵ 第二只蓋罐，即此段討論之〈鑲金銀胎內填瑯瑯嵌寶蓋罐〉；第三、四只文物，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在命名為〈銀胎綠瑯瑯嵌寶石海螺〉及〈銀胎綠瑯瑯嵌寶石靶碗〉，經許教授目驗，總結其除了與清宮造辦處的後仿品，在瑯瑯顏色、裝飾風格、與鑲嵌寶石種類不同之外，更觀察出靶碗以印度獨有的高純金鑲嵌法製作。¹⁰⁶

但是此批供物來源並不一定是同一源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只〈鑲金銀胎內填瑯瑯嵌寶蓋罐〉之紋飾與瑯瑯燒造風格，與北京故宮所藏兩件文物並不盡相同，其可能製作地點，需要再從珠寶鑲嵌、瑯瑯等技法觀察，再考慮上述推論的可能性。蓋罐所嵌紅寶石，是預先鑄出凹槽再用應是膠類黏接固定，其外則皆有一圈金色框邊，乍看之下有如以 *kundan* 高純金法鑲嵌（圖 41），¹⁰⁷ 如貼金圈法、堆膠貼金箔法或金托法等；¹⁰⁸ 但是事實上，蓋罐之框邊是預先鑄出，並未涉及以高純金固定寶石。蓋罐之嵌寶技法，可見於新疆、中國製作玉器之單嵌法，而非典型印度技法。¹⁰⁹ 蓋罐花朵間以花莖相互連結、點綴葉片，紋飾線條稍顯僵硬的風格，又較類似土耳其式的嵌寶法。¹¹⁰

以瑯瑯工藝而言，蒙兀兒（1526-1858）與卡札爾（1779-1924）王朝時代的印

105 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頁 17-20。此蓋罐過去認為是西藏製作，請見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19、202。班禪此行，進獻不少製作於印度之貢物，詳見王曉晶，《六世班禪進京史實研究》，頁 100-104。其他相關此器之討論請見秦鳳京，〈六世班禪朝覲與清廷回賜文物存考〉，《歷史檔案》，2008 年 3 期，頁 68-77。

106 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頁 18-19。清宮造辦處後來仿製內填瑯瑯嵌寶靶碗三份，其碗心皆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圓框款，一件原藏養性殿，現藏北京故宮；另兩只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原藏養心殿之〈內填瑯瑯嵌寶靶碗〉（故雜 1318）與瀋陽故宮之〈內填瑯瑯嵌寶高足蓋碗〉（中琺 1459）。班禪所進貢物及仿器目前所收地點，請見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頁 17，表一。另，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只與六世班禪進瑯瑯嵌寶蓋罐非常類似的作品，但是無任何文獻記載其來歷，詳見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頁 17。

107 Manuel Keene, *Treasury of the World: Jewel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the Mughal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1), 17.

108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22-24。

109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頁 23。

110 吳偉蘋，〈淺析伊斯蘭玉石器的黃金與寶石鑲嵌〉，《故宮文物月刊》，334 期（2011.1），頁 57。

度，運用在珠寶裝飾上的琺瑯技藝，可謂罕有對手，只是其形成的歷史未見於史冊。其源頭很可能是約在十六、十七世紀受雇於蒙兀兒宮廷的歐洲工匠帶來的技術。¹¹¹ 蒙兀兒帝國第四代君主，賈漢吉爾（1569-1627；1605-1627 在位）的十七世紀初期精美短劍，就有用琺瑯裝飾的痕跡。¹¹² 但是，琺瑯技術的流傳或可追溯至蒙兀兒王朝之前，即十六世紀，德干高原即有一些琺瑯製作中心，隨後此藝在印度次大陸廣泛傳播。¹¹³ 齋浦爾、瓦拉那西、勒克瑙、德干高原、喀什米爾等地皆有內填琺瑯器的製作。¹¹⁴

班禪進獻蓋罐上重複出現的的紋飾，與一件約 1750 年製作於勒克瑙的鍍金銀胎藍色透明琺瑯嵌寶水煙罐組，裝飾母題相當類似（圖 42）。¹¹⁵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在十八、十九世紀是製作透明藍、綠色內填琺瑯的中心。¹¹⁶ 此件臥足水煙罐，鼓腹罐身以規整的四列有左右對稱小葉、花心明顯的一莖五瓣花裝飾，斜肩部分有一圈五瓣花與有綠色琺瑯塗敷或鑲寶之捲草葉紋。班禪進獻蓋罐罐身，是以類似的五瓣花，搭配原有琺瑯塗敷與鑲寶之捲草葉紋裝飾；左右有對稱小葉的一莖朵花，則用來裝飾托座。水煙罐與班禪進獻罐兩者蓋紐皆為橢圓形花苞。勒克瑙水煙罐是以高純金技法嵌鑽石、紅寶石等寶，因此寶石亦有一圈突起金框。班禪進獻蓋罐鑲嵌寶石非以高純金技法製作，應非勒克瑙此地所作，但是見於此件十八世紀中期華麗洗鍊水煙罐之裝飾母題，應是班禪進獻蓋罐裝飾的模仿來源。

而如此只蓋罐之如祖母綠寶石般清亮的深綠色琺瑯，可在多件蒙兀兒帝國文物尋得，例如十八世紀中期之頭巾冠嵌寶配飾，其背面即以相似之綠色琺瑯表現草葉（圖 43），而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十八或十九世紀傑作，鑲金嵌寶玉鐲（圖 44），其金質龍首塗敷清亮綠琺瑯，透過釉層隱約可見其下金屬有不規則條狀裝

111 Marilyn Jenkins and Manuel Keene, *Islamic Jewelry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123; Manuel Keene, *Treasury of the World: Jewel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the Mughals*, 62.

112 Stuart Cary Welch, *India: Art and Culture, 1300-1900*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5), 198-199.

113 Manuel Keene, *Treasury of the World: Jewel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the Mughals*, 62.

114 Rita Devi Sharma and M. Varadarajan, *Handcrafted Indian Enamel Jewellery*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4), 25-69.

115 圖版出自 Anna Jackson and Amin Jaffer ed., *Maharaja: the Splendour of India's Royal Court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9), 137

116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6045/huqqa-base-unknown/>（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9 日）。Madhu Trivedi, *The Making of the Awadh Culture* (Delhi: Primus Books, 2010), 246.

飾，一如蓋罐。¹¹⁷以透明藍色琺瑯點繪蓋罐蓋紐花苞下之葉片、或蓋面及托座之圓形或水滴狀裝飾，此類彷彿閃亮薄片寶石點綴的意趣，在一件十七世紀中期水煙罐環之罌粟花、葉裝飾，¹¹⁸或十九世紀透明琺瑯金頭巾冠飾之孔雀尾羽，皆可觀察到（圖 45）。¹¹⁹

以鑲嵌技法而言，蓋罐並未採用印度傳統高純金技術，雖然其嵌寶的金色邊框，意圖仿製其效果；就紋飾形式而言，目前可見，則是與北印度勒克瑙地區作品相近，雖然風格較為生硬。但是在透明琺瑯技法的運用，印度工匠自十六世紀以降，不僅嫻熟此技，此件蓋罐之藍、綠色透明琺瑯及裝飾意趣，與印度文物確實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是在次大陸周邊國家亦有琺瑯工藝流傳，例如伊朗的伊斯法罕與阿富汗，是以此件蓋罐之真正製作地點，在有進一步資料可供佐證之前，無法確定，只能暫訂其為印度風格。¹²⁰

（四）金碗、舍利與盒

金質刻花侈口圈足碗（故雜 1869；口徑 15.8 公分，足徑 7.1 公分，高 9.9 公分；圖 24），附黃籤墨書：「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因值年班，呈進金碗一箇。」原帳並記：「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一日呈進」。「察木多」今名昌都（ཆབ་མང་），此地是藏東康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及茶馬古道交通樞紐，¹²¹「帕克巴拉」（འཕགས་པ་བླ་）即藏語「聖天」，第一世從宗喀巴直傳弟子受戒，法名帕克巴拉（1439-1487），遂成此系名。第三輩起駐錫康區格魯派最早建立、亦是第一大寺之昌都強巴林寺，明末清初地位逐漸提升。¹²²從乾隆時期起開始入貢，但以路

117 Marilyn Jenkins and Manuel Keene, *Islamic Jewelry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23.

118 Stuart Cary Welch, *India: Art and Culture, 1300-1900*, 261-262.

119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7068/turban-ornament-turban-ornament-unknown/>（檢索日期：2017年3月19日）。

120 Rita Devi Sharma and M. Varadarajan, *Handcrafted Indian Enamel Jewellery*, 46-47. 此外，或許需釐清，此件文物似應非中國所做。觀察清代廣東與宮廷造辦處製作的透明琺瑯器，前者多製作藍色而非此類深綠色內填琺瑯作品，並且也並無此深具異國風情的器型，請參陳夏生，《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頁 41-42、288-289。而以前述造辦處製作，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內填琺瑯嵌寶靶碗〉為例，其為此類深綠色內填琺瑯作品，風格嚴謹端正，燒造技術精湛，和蓋罐托座粗放點畫花葉的風格不同；此外，蓋罐托座之淺綠色不透明琺瑯裝飾，表面有不少因氣泡產生之樓眼（圖 41），管見十八世紀清宮作品已無此類相當明顯的缺憾。至於是否為西藏工藝，目前尚未見西藏揭露此類工藝資料可資參考。

121 梁豔，〈近二十年（1989-2009）昌都研究綜述〉，《中國藏學》，2010年3期，頁 86。

122 管轄藏東五十寺，僧眾四千多人、民戶七千多戶。土呷，〈西藏昌都歷代帕巴拉活佛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研究〉，《西藏研究》，2012年3期，頁 18。另相關討論請見土呷，〈西藏昌都帕巴拉

途遙遠，皇帝恩准不需定期遣使入貢，後成為「四年一貢」定制。道光年間（1821-1850）皇帝以「察木多地方距京程途較遠」，將進貢次數改為每六年一次。¹²³

金碗外壁四如意雲型開光，分別刻有芝蘭、萱草、老梅與結實累累的桃樹，其外再以喜旋紋等紋樣裝飾，相當具有漢地風情，或與昌都地理位置有關。¹²⁴ 第九輩阿旺羅桑晉美丹貝堅贊（*ང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འཛིགས་མེད་བསྟན་པའི་བྱུ་མཚན་*，1849-1900），同治皇帝封為「靖遠禪師」，光緒皇帝賜「法輪綏遠」；此碗為光緒二十一年（1896），其最後一次年班所進。¹²⁵ 史載此系特色土貢為「金碗、黃連」，或與此地有藏地數一數二，工藝高超的金屬工匠有關。¹²⁶

「舍利」為梵語 *sharira* 音譯，多指佛陀遺骨或高僧遺骨，「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¹²⁷ 因此為教徒所供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兩套舍利，一收在紅銅舍利盒，有包在黃紙內白珠狀舍利，紙上墨書：「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月初三日收，第穆胡（呼）土（圖）克圖進，舍利二顆」。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首位被皇帝任命掌管西藏政權，代理年幼達賴喇嘛攝政之第六輩第穆呼圖克圖阿旺絳白德勒嘉措（*ངག་དབང་བྱམས་སྤེལ་བདེ་ལེགས་བྱ་མཚན་*，1724-1777）所進。¹²⁸ 後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造金宗喀巴造像之裝臟。¹²⁹ 另有舍利，原分別供於同式兩件小金盒（故雜 1871、1872；盒長 2.6 公分，寬 2.2 公分；圖 25），共貯於描金花卉紅地木盒（長 6.2 公分，寬 3.4 公分，高 2 公分）。有黃籤：「乾隆六十年（1796）

活佛與帕巴拉呼圖克圖名稱沿革考釋》，《中國藏學》，2012 年 1 期，頁 81-85；強巴林寺沿革請見王開隊，〈康區藏傳佛教歷史地理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9），頁 68-69。

123（清）崑岡等修，《大清會典事例》，頁 769。討論此系之朝覲年班請見張雙智、張羽新，〈清代昌都強巴林寺帕克巴拉活佛朝覲年班制度〉，《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 卷 5 期（2010.9），頁 36-39。

124 漢人工匠所做藏式法器在蒙古、青海、康區等地流通，甚或在這些區域設立鋪子，因此漢風圖案也影響到當地生產的法器，請見 John Clarke, "A Group of Sino-Mongolian Metalwork in the Tibetan Style," 72. 或值此之故，金碗紋飾與因不同工藝技術而使金屬發黑的現象，近於漢地文物，相關討論請見前。

125 報旺，〈昌都絳巴林寺及帕巴拉佛世系源流簡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 6 期，頁 28。

126（清）崑岡等修，《大清會典事例》，頁 768。昌都以銅匠著名，達賴十三世時期，為重用本土工匠，解散拉薩雪堆白工坊尼泊爾匠人，但是衛藏地區缺乏工匠，必須招集昌都銅匠填補空缺，可見其工藝傳統。請見袁凱錚，〈西藏東部藏傳佛教銅佛像製作工藝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0），頁 38。

127（北京）曇無讖譯，《金光明經》，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冊 16，頁 354a。

128 王獻軍，〈西藏攝政制度述論〉，《西北史地》，1998 年 4 期，頁 76-78。

129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84。

十一月十六日收，班禪額爾德尼進，九成金佛鍋二座，內供迦葉佛舍利二顆。共重六錢。」為七世班禪喇嘛丹貝尼瑪（བཟུང་པའི་ཉི་མ་，1782-1853）所進；另有清宮白籤：「九成金佛鍋二座，內供迦葉佛舍利一顆，共重六錢。」現存一顆舍利。藏人尊此為過去七佛中，早於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佛一世之迦葉佛（Kashyapa）舍利。金盒六角形，以鈕扣合，位於上方之鈕皆為中空，可穿繩，用以配戴，為藏地常用於供奉佛造像、舍利等聖物之小盒嘎烏（Ga'u），蓋面飾嵌松石六瓣寶相花，並以連珠狀細絲盤繞捲草紋，做工精細，為喜馬拉雅山地區少數具有相對年代之作品。¹³⁰

四、其他材質類法器

（一）數珠

清宮所收數珠依其材質，可大分為三類，第一為半寶石類，多在年班進貢、回禮等吉祥場合入貢，現存數量不少，將另文討論；此外有骨質即噶布拉、木質等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為數不多的噶布拉數珠，其中兩掛，皆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喇嘛赴京為皇帝頌壽所進，清末皆藏於養心殿。一串數珠（故雜 1938；徑 31 公分，珠徑 1.3 公分，高 0.6 公分；圖 26），一百一十顆，骨質色澤勻淨，以二茶色琥珀、二珊瑚為佛頭，記捻三掛，金、銀質記捻，各以同材質五鈷金剛杵為墜腳，藍色珠記捻則以金質金剛杵型金飾為墜腳。今存原應貼於所貯盒內之四體字白籤：「嘎（噶）布拉數珠——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初七日班禪進。」（圖 26）為六世班禪喇嘛在避暑山莊，為皇帝七十大壽慶典所獻。¹³¹ 另一串數珠（故雜 579；徑 45 公分；圖 27-1）盛貯於木胎皮匣，匣內襯織錦，以木隔斷，骨質百零八顆圓柱狀數珠，呈溫潤茶色，有硃砂遺痕，每顆珠間，各襯一已鏽蝕生出藍色粉末之圓形金屬墊片。¹³² 以珊瑚為佛頭，金記捻三掛，鑲松石金剛杵型金飾為墜角，另串有藍色松石。匣內四體字白籤：「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二十七日，班禪額爾德尼在寧壽宮念經，呈進嘎（噶）布拉念珠一盤。」（圖 27-2）

130 請參 Jane Casey Singer, *Gold Jewelry from Tibet and Nepal*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99, 129。

131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頁 141。班禪八月初七日在被乾隆改名為「四知書屋」的「依清曠」遮丹書克，然而韃單並未記錄此掛數珠，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頁 260。

132 非松石墊片。

為班禪喇嘛赴京後，為皇帝最後說法之日所進。¹³³過去漢地流傳班禪喇嘛為皇帝最後說法之處在雍和宮，與六世班禪喇嘛藏文傳記，及最新研究指向在寧壽宮的說法不符，上述皮匣及四體字籤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呈覽奉核後造辦處所作，實屬可供佐證的第一手資料。¹³⁴匣蓋另貼黃綾籤：「養性殿西暖閣佛樓上供。」班禪寧壽宮說法後，此串數珠或即供奉於此宮後寢之養性殿。

木質包括種子類數珠，出處明確者共三掛。鳳眼菩提念珠一掛（故雜 7724；徑 35 公分；圖 28），拴黃籤：「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二十七日收，章嘉胡圖克圖進，鳳眼菩提念珠一盤，珊瑚佛頭塔，上拴蚌珠一顆、茶晶豆一箇。」鳳眼菩提種子有芽眼如細目，因名之，素雅潔淨；佛頭及佛頭塔為珊瑚材質，另拴有蚌珠豆及茶晶豆各一，另在佛頭塔兩側各有銀鍍金環各一、二只，透露此串念珠原應如其他數珠，在三只環下拴有三串記捻，今佚失。菩提子念珠一串（故雜 7712；徑 38.2 公分，珠徑 0.6 公分；圖 29），拴黃籤兩張：「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二十一日收，總發祁得福交，嘎（噶）巴拉念珠一串、計珠一百八個。」「章嘉呼圖克圖圓寂，呈進念珠一串。」所述為「嘎（噶）巴拉」念珠，似應考慮為誤拴，然而另有白色包裝紙墨書，注記相同內容，不宜驟以籤條錯置考慮，恐為清宮太監誤認此泛黃、並如骨殖有孔隙的數珠為「噶巴拉」材質。¹³⁵查六輩章嘉呼圖克圖耶喜丹貝尼瑪（ཡེ་ཤེས་བསྟན་པའི་ཉི་མ་，1878-1888）圓寂於光緒十四年（1888），正符合此籤記錄之年代。略為泛黃的菩提珠，以珊瑚為佛頭及佛頭塔，佛頭兩側都有銀圈托，並拴有鍍金八顆、銀質十顆記捻共兩串，樸質無華。白檀念珠一串（故雜 7723；徑 35 公分、珠徑 0.6 公分；圖 30），拴黃籤：「白檀念珠一串，珊瑚佛頭塔，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月初二日收，首領郭雙喜交。」、「那木喀呼圖客（克）圖圓寂，呈念珠一

133 班禪六世八月底從熱河動身前往北京，九月初到達，先後在黃寺、香山等地舉行說法與法會等，十月二十七日為皇帝說法後，即出痘，十一月二日圓寂，見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頁 142。班禪此行，十月三日進大利益無量壽佛，國立故宮博物院只餘其佛龕，即造辦處製作進呈之嵌松石銀鍍金佛鍋一座（故雜 1838）。

134 「十一日催長大達色來說，太監鄂魯里交嘎布布拉念珠一盤，珊瑚佛頭松石塔，松石豆一個，金鏡鉞式記念三挂，眾（仲）巴胡（呼）土（圖）克圖歲本充布呈進，傳旨配鞞皮畫金匣盛裝得時，寫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禪厄爾德尼在寧壽宮念經，呈進四字樣白綾籤，欽此。于本月十八日催長大達色金江將嘎（噶）布拉念珠一盤配得槍（鞞）皮畫金合牌匣樣，交大監鄂魯里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欽此。於五月二十四日員外郎五德等將嘎（噶）布拉念珠一盤，配得槍（鞞）皮畫金匣，交大監鄂魯里呈進，交寧壽宮訖。」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4，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油作〉，頁 753。眾（仲）巴呼圖克圖即班禪之兄，札什倫布寺大強佐。關於漢文史料對於班禪喇嘛在宮中傳法紀錄模糊的討論，請見王曉晶，《六世班禪進京史實研究》，頁 192-194。

135 另有白籤：「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二十一日收，總發祁得福交，嘎巴拉念珠一串，計珠一百八個。」及黃籤：「五百六十號。」

串。」素淨古舊念珠百零八顆，以珊瑚為佛頭、佛頭塔。那木喀呼圖克圖為黃教六大寺，甘肅拉卜楞寺寺主以下四大活佛，為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為第五世噶藏晉美南喀（བསྐྱལ་བཟང་འཛིགས་མེད་ནམ་མཁའ་，1875-1899）圓寂所進。¹³⁶ 根據上述黃簽以及歷史文獻紀錄對照，此類木質數珠，多為高僧生前持念，圓寂後轉贈皇帝，前述鳳眼菩提數珠，應是二世章嘉國師遺物，高宗初即位，由三世章嘉國師轉贈。¹³⁷

（二）其他

最後，與特殊事件相關而進獻文物三組件，即乾枯褐色樹皮數片（故雜 560-564）以及花朵、枝葉（故雜 565），每一片樹皮隱約可見藏文，分別為 Hūm、Om、Da、Pa（故雜 560、562-564）以及應為 Ra（故雜 561）之種子字，共貯於木胎漆盒（長 28 公分，寬 14.8 公分，高 9 公分；圖 31）貼四體字白籤：「乾隆十四年（1749），章嘉胡（呼）土（圖）克圖欽奉上諭，自阿穆多地方梵宗寺，恭請大聖宗喀巴降生時，割臍滴血處自然生成，有番唵等字樣大利益白檀香樹皮花葉。」即此樹葉、樹皮，來自格魯派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臍帶滴血處生長的白旃檀樹，為三世章嘉呼圖克圖所進。「阿穆多」即安多（ཨ་མདོ་）地方，在今青海湟中縣，後建成塔爾寺，乾隆十四年（1749）御賜寺名「梵宗寺」。盒內另有白籤一張，為內務府官員所撰滿文奏稿，說明樹皮、枝葉來源。¹³⁸ 章嘉國師出身的青海佑寧寺曾多次乞請國師回安多，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獲准歸故里兩個月，行前，三世章嘉國師為進一步保護青海地區寺院，請皇帝頒賜塔爾寺、佑寧寺等御匾，盼皇恩澤被，免受漢人貪官需索破壞。¹³⁹ 上述進獻之聖樹樹皮、枝葉，應即是主持賜「梵教法幢」匾後，攜回京城贈與皇帝。¹⁴⁰

另有蚌殼五佛冠（故雜 6084；長 82 公分；圖 32-1），髑髏陰刻填紅漆顱骨裂

136（清）崑岡等修，《大清會典》，頁 643。李德成，〈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述略〉，《中國藏學》，2011 年 S2 期，頁 73-74。

137 圓寂後轉贈數珠之例另請參注 11。

138 石守謙、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頁 49。

139（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ལཱ་བཀའ་ལྷན་པོའི་མཁའ་མགྲོན་མཆོག་），《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 277-278。

140 御匾仍保留在主殿大金瓦殿內，聖樹在殿外，請見李志武、劉勵中編，《塔爾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圖 103、108。四川大金川之役，從乾隆十二年（1747）持續至十四年（1749）十月，其間三世章嘉國師不僅助皇帝翻譯與大金川首領溝通文書，亦多次被詢關於此役意見，戰爭最後一年又允出身青海國師回鄉，亦可窺見乾隆皇帝以黃教大喇嘛加強羈縻青、藏地區的決心。（清）慶桂監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頁 609、844。

縫、眼窩、鼻腔及森然牙齒，頂有寶相花，外飾火焰紋。¹⁴¹ 五髑髏尺寸，中間最大、往兩端遞減，等距縫於珊瑚色頭帶，其間串以小珍珠，間飾四顆瑪瑙珠，兩端則各鑲釘一珊瑚珠與藍色料珠，尾端內側有藏文墨書。此類冠飾為用於祭祀憤怒尊時跳神之莊嚴。¹⁴² 所貯木盒蓋刻四體字：「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初九日，大學士公福康安委員解到，廓爾喀呈繳，札什倫布，鑲嵌蚌殼五佛冠一頂。」（圖 32-2）據此可知，此冠是第二次廓爾喀戰爭後，戰敗的廓爾喀繳回搶奪自札什倫布寺的寶物，故亦於此討論。¹⁴³ 另附黃籤：「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初九日收，造辦處呈覽，蚌殼五佛冠一頂。」¹⁴⁴

最後，札古札雅木碗一只（故雜 1964；徑 12.2 公分，高 3.8 公分；圖 33-1），淺杏黃色，撇口淺腹，質地堅硬細膩，打磨光滑，上臘，如火焰之紋路清晰可辨。碗內仍裝有已氧化成碎屑的藏紅花，有黃色布袱，原應用來包覆木碗。此類木碗為西藏特產，古傳由「扎古（卜）扎雅木」製成，具解毒功效。¹⁴⁵ 藏語「札古（木、卜）」為「草根」，「札雅」為「樹瘤」音譯，故可直譯為根瘤碗。¹⁴⁶ 木碗是藏族普遍使用餐具，多由樹根或巨瘤製成，品種頗多，有說出自西藏山南錯那縣或雲南中甸，而前者更有門巴族專門製作木碗之世家。¹⁴⁷ 但是此只木碗，並非瘿木，是以非以樹瘤成造；而類似的木紋、色澤與木材質地，可見於櫟屬如青剛櫟製作之家具；

141 「中央一葉，背後淺刻折枝梅花圖，運刀流暢，顯然係由漢人所做的物件改刻成。」詳見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117。

142 馮明珠、索文清編輯，《聖地西藏》，頁 222，259。

143 有以為拴有黃籤：「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十一日收……」之藏式垂掛、松石耳飾與珊瑚松石環絡衣為同日上呈，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號又為同一號，因此認為可能是與此件同時入呈的廓爾喀戰後歸還文物，見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12。但是如上述，五佛冠是福康安同年四月初九日呈，六個月後正式入藏清宮，因此黃籤記錄「十月初九日收」，與四月初即入藏文物，恐不能視為同一批呈繳。垂掛與五佛冠皆為「金一五四零」號，但是同屬此編號者，有一千餘件文物，皆為首飾、配飾，有此類藏式配飾、耳飾，但是亦有青玉豆瓣頭簪、雲玉鐲等與藏地無涉文物。

144 另有黃籤四張，「覽蚌殼五佛冠一頂，穿碎小正珠八十九顆，蛤蚌珠一顆，珊瑚珠兩個，瑪瑙珠四個，玻璃珠兩個，楠木匣盛。連代（帶）共重一兩三錢。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初九日收，造辦處呈。」另一為後代點檢紀錄及編號：「八百五號，蚌殼五佛冠一頂，穿碎小正珠（珠）八十九顆，蚌殼朱（珠）一顆，珊瑚朱（珠）兩個，瑪瑙朱（珠）四個，玻璃朱（珠）兩個，楠木匣盛，連代（帶）共重一兩三錢。」「八百十八號。」「九百廿四。」

145 「扎卜扎雅木，出西藏，草根結成者，製以為碗，可解諸毒。」出自（清）嵇璜、劉墉等奉敕撰，《清朝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7456。

146 林歡，〈故宮博物院藏札卜札雅木器〉，《文物》，2015 年 4 期，頁 64-66。

147 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頁 183，原文「札雅」做「察牙」。或有以為札木札雅位在錫金、亞東往嘉玉寺途中；或以為「札木札雅」是拉庫爾木樹瘿，詳見蔡玫芬，《皇權與佛法》，頁 20。最近研究以為是產於今日喀則仲巴縣境羌塘草原區，以此種植物命名的劄布耶鹽湖附近的金露梅根瘤，林歡，同前注。

木碗無樹心痕，顯示用料是直徑至少 25 公分以上的木材。¹⁴⁸

有黃籤：「榮增濟隴（隴）呼圖克圖，因宣宗成皇帝大事恭請聖安，進劄（札）木（古）劄（札）雅木碗一個，內裝紅花。」（圖 33-2）¹⁴⁹ 清宣宗道光皇帝，諡號「成皇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黃籤紀錄之「大事」應指祭祀，為咸豐二年（1852）「大葬宣宗成皇帝於慕陵。丁巳，上還京，恭奉宣宗成皇帝，孝穆、孝慎、孝全三皇后神牌升祔太廟。」一事。¹⁵⁰「榮增濟隴（隴）呼圖克圖」之「榮增」指年幼達賴喇嘛經師，查此系九世濟隴呼圖克圖阿旺羅桑丹貝堅贊（བཀའ་དབང་སྒྲོ་བཟང་བཟུང་པའི་བླ་མ་མཚན་，1811-1854）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奉旨任十一世達賴經師，圓寂於咸豐四年（1854），此碗為其為道光皇帝入祀祖廟進奉致禮之貢。¹⁵¹

五、結論

（一）清末收貯地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三十三組件具有入貢者資料的藏傳佛教法器，製作年代最早可上溯至明朝初年，最晚為晚清，為年班朝覲、賀壽、圓寂等場合致意之禮，並涉及歷史上四場事件，即乾隆十三年（1748）青海塔爾寺賜御匾、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入京、乾隆五十八年（1793）廓爾喀戰爭以及咸豐二年（1852）道光皇帝葬於慕陵入廟。除了理塘宣撫司進獻及廓爾喀繳回文物，皆是黃教高僧神職人員進貢，珍藏於紫禁城，除了裝藏於宗喀巴造像之第穆呼圖克圖進舍利收貯於熱河。

其中十三組件，供奉於皇帝日常活動的養心殿，占最大宗，與達賴喇嘛一系相關者，有實為十五世紀明廷賞賜舊物之二、三、五輩達賴手執鈴杵、手鼓，十七世紀中期五輩進金曼達盤及應為十九世紀上半葉九或十世進獻手鼓（呂 1136、1137、

148 殼斗科植物是構成西藏森林植被與高山灌叢的主體，而其中櫟屬，包括青剛櫟亞屬是其中分布最廣的屬，一直延續到雲南。請參周浙昆等，〈西藏殼斗科的地理分布〉，《雲南植物研究》，1995 年 2 期，頁 145-146。此類木碗木料的來源，有待具有木業專業知識之學者進一步研究，在此僅提供一可能之觀察。

149 另有清宮白籤：「三十四號」。

150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頁 719。

151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頁 14528、14529。

1167、1298)；¹⁵² 班禪喇嘛一系相關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赴京頌壽所進兩掛噶巴拉念珠、瑛瑯嵌寶蓋罐與應為十八世紀上半葉五世進獻手鼓(呂 1152、1209、1178、1298)；¹⁵³ 章嘉國師一系進獻有年代最晚為十七世紀之歷輩所執鈴杵及乾隆十四年(1749)三世進白檀樹皮、枝葉(呂 1299、1197)；¹⁵⁴ 濟隴呼圖克圖一系進獻年代約在十五世紀之其歷輩手執鈴杵、十八世紀末八世進噶巴拉碗及十九世紀九世進內有藏紅花札卜札雅木碗(呂 1299、1238、1188)。¹⁵⁵ 收藏於此的法器，多是具有層壘歷史意義的古老法器，如黃教各系歷輩祖師手執，或是史上兩次著名的達賴、班禪兩系入京覲見文物；或是祥瑞聖物，如在宗喀巴誕生處生長之白檀樹皮、葉與得道聖者之噶巴拉碗等。

此外，章嘉呼圖克圖一系進獻之歷輩手執、或為四世、五世所進三只手鼓、以及應為三世進一套鈴杵(午 1、3、18、20)，和時代應為十八世紀早期、摩泐嚴重的七世達賴與五世班禪進金剛鈴杵(午 2、19)六組件皆編為「午」字號，目前無法確定其清末所在殿堂。而皇子居所毓慶宮前殿惇本殿佛堂，則有五組件法器，深貯小木櫃，計有十八世紀末七世班禪喇嘛進舍利及盒，及十九世紀進獻之八世濟隴呼圖克圖進手鼓、十二世達賴喇嘛進鑲松石金輪、理塘宣撫司德讓江錯等進金曼達盤及九世察木多呼圖克圖進金碗(餘 1235)。¹⁵⁶ 十八世紀末拉穆吹忠進曼達盤、金剛杵及白螺皆藏中正殿雨花閣(玉 169-6、169-7、169-10)。¹⁵⁷ 十八世紀中三輩章嘉進應為二世生前持念之鳳眼菩提念珠、十九世紀末六世章嘉、五世那木喀呼圖克圖圓寂後進贈之菩提子、白檀念珠各一串及十八世紀末廓爾喀回繳蚌殼五佛冠則藏於永壽宮(金 1537-65-48-23、1540-32)。¹⁵⁸ 最後，清末六世土觀呼圖克圖等頌慈禧太后六十大壽進銀曼達盤，則藏於慈寧宮(稱 216)。¹⁵⁹

(二) 對於清宮法器製作的影響

此批法器多與金屬工藝相關，衛藏、康區、川西等地進獻者，除了兩套明廷舊

152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6，頁 293、294、300。

15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6，頁 293、295、296、300。

154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6，頁 296、300。

155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5，頁 23。

156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6，頁 12。

157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7，頁 327、8。

158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6，頁 295、298、300。

159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輯 10，頁 17。

物，及應來自南亞或中亞之瑤瑯嵌寶蓋罐，自其技術、風格觀察，皆應在上述進獻相關地區製作；反觀駐京青海出身之章嘉及土觀呼圖克圖進獻十八、九世紀文物，如手鼓、曼達盤等，其工藝與藝術特色，多與京城造辦處或漢地成造文物較為相近，應是漢地所做；不同地域喇嘛進貢方物之工藝風格與美學傳統，確有差異。

因藏地獨特自然或人文條件孕育之札卜札雅木碗、噶巴拉碗等法器，乾隆皇帝惟能低迴讚嘆，留下為數極少的吟詠法器之御製詩、文。¹⁶⁰而，乾隆皇帝對於宮廷成造法器、佛像重視對宗教意義的闡發和對古德先賢的追思，¹⁶¹或值此之故，上述供奉於養心殿法器，其中歷史意義深遠者，乾隆皇帝則傾造辦處之力仿製，對於清宮法器製作，產生一定的影響。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帝嘗試改進金剛鈴之鈴聲，以三世章嘉國師提供西藏銅法鈴鑄造配方及傳教士提供西洋鑄鐘配方等多管齊下的試驗中，得到滿意成果，於是開始就年款、尺寸等定下規格，分成大、中、小三種尺寸製作，一直到四十四年間共鑄造一百多份。¹⁶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十多只金剛鈴，其中一只柄部刻「乾隆年造」四字楷書款（故雜 840；高 21.3 公分，徑 10.3 公分；圖 35），屬大型鈴；鈷部底座摩羯魚吐出豐厚捲葉、及配合內側鋒利勾牙之角度、寶瓶部分以四輕薄蓮瓣覆蓋等，管見皆只見於藏於養心殿之二、三、五輩達賴手持鈴（圖 6-1），而其鈴身亦鑄藏文、鈴內有 Om、Ah、Hūm 藏字、紋飾亦是採用類似的寶相花，只是改為如前述班禪喇嘛所進者表現法輪之「花輪」紋飾。¹⁶³然而鈷部明顯採取長橢圓形的造型，以及佛母高額窄頤瘦長的開臉，改變了整體比例，再加上泛紅金色鈴身為紅銅高錫的新配方；讓造辦處作品，獨樹一幟。

一器外壁底有「大清乾隆年敬造」六字鑿款（圖 40-2）曼達盤，原藏法國楓丹白露宮中國館（圖 40-1），形制與五世達賴喇嘛進金鑲松石曼達盤極為相似，應是清宮嘗試仿製的作品；然而，除了松石、碩大鮮紅的珊瑚珠，還增加了珍珠以及被清宮理解為「紅寶石」，但應是石榴石的紅色寶石裝飾，光彩奪目。¹⁶⁴細究其工

160（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三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頁 676），卷 16，〈贊〉；（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三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頁 295-296），卷 1，〈古今體七十五首〉。

161 謝繼勝主編，《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頁 822。

162 此批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造辦處開始綜合改進配方的法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清點，共造了一百二十七分，詳見李中路，〈乾隆中期宮廷銅法鈴制作的創新與變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 年 3 期，頁 123-127。

163 此只法鈴鈴身「花輪」裝飾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後、「乾隆年造」四字款為三十九年（1774）四月底後之定制，因此最早製作年代為三十九年（1774）。

164 Colombe Samoyault-Verlet et al., *Le Musée Chinois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Paris: Editions de la

藝，五世達賴喇嘛進貢者，盤面鑲嵌色澤勻淨松石，松石易碎，但是每片磨切工整，有圓形、長方形、葉形等各種樣式，並且多呈現邊緣較中心薄，造成穩妥鑲嵌在基座的視覺感。盤心八層金屬基座，上、下多以大小兩圈連珠紋滾邊，間或以金絲焊雲紋、捲草紋甚或焊粟米珠點綴（圖 1-1）。而中心須彌山、七金山以外的金屬基座底層皆有連珠紋裝飾，日、月、幢、傘等四吉祥紋飾基座，更有直徑約在 1 毫米左右的焊粟米珠。（圖 1-4、圖 1-5）器壁主紋飾八吉祥與五欲供之上、下，則有以模具敲擊成形的大連珠紋滾邊（圖 1-3）。

乾隆款曼達盤面鑲嵌之綠色松石，形狀未如前述曼達盤多元，磨切水準亦參差不齊，如中心表現七金山的圓型與水滴型松石，有左右厚薄不均的情況；代表四財的松石則未與鑲嵌基座緊密契合，松石與台座間有明顯縫隙。而目前各洲及四財的基座旁，都有一圈明顯焊痕，盤面不似前述曼達盤盤面乾淨平整（圖 40-1）。而器壁鑿刻之紋飾，雖盡力模仿，但不免板滯，紋飾間有留白，連珠紋各珠間亦有空隙，並非真確地如珠串，與西藏進曼達盤側壁豐美熱鬧與富層次感不同，清廷此類工藝或略遜一籌，雖然在盤面須彌山底部，有造辦處作品罕見的焊粟米珠，透露工匠亦非泛泛之輩。¹⁶⁵ 清宮模仿精美的「偉大的五世」達賴喇嘛所進曼達盤，或為思古之故，但是也讓清宮工匠不僅開拓視野，嘗試少見的裝飾技法，也具有掌握喜馬拉雅山地區常見工藝技術的實力。

事實上，上述清宮作品，雖然仿作入貢法器，但實為重新演繹，烙印了皇帝的品味。相較於五世達賴所進曼達盤，乾隆款曼達盤金屬工藝技術或稍嫌遜色，但是所鑲半寶石種類更多、數量更夥；而前述造辦處製作手鼓腰箍，鑲嵌半寶石多較藏系所進者尺寸更大，並高凸浮起，在不同類法器，皆展現皇家富貴與恢弘氣勢。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1994), 66-67。2015 年此館發生竊案，竊賊盜去中國館十五件文物，包括此件曼達盤，所有文物目前仍下落不明。見 http://www.lemonde.fr/arts/article/2015/03/01/cambriolage-au-chateau-de-fontainebleau_4585470_1655012.html（檢索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1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具有焊粟米珠工藝文物，為數不多，管見多與外藩有關，如回部之金屬鈕、墜飾等，最具代表性文物為乾隆四十九年（1784）新疆哈密進貢的乾隆御用金碗，討論請見賴依縵，〈清乾隆御用金碗〉，《故宮文物月刊》，300 期（2008.3），頁 140。另有原為西藏頭飾，被改件之絲穗佩飾，附清宮黃籤「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二十八日收。」請見賴依縵、張湘雯等，《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頁 80。國立故宮博物院另藏有耳飾，見陳夏生，《溯古話今談故宮珠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159。以及手環與戒指等，鐳有為數不多的粟米珠，多為藏式或中亞外藩風格。另有清宮造辦處作品金鑲松石等五方佛與救度母造像之蓮座，亦可見焊金珠工藝，但是製作者是從藏地延攬赴京的尼泊爾工匠，見賴依縵，〈各族巧匠工藝結晶：乾隆 9 至 11 年製五方佛與救度佛母數珠箱〉，《九州集刊》，35 期（2015），頁 79、102。

此外，上述清宮造法器所鑲綠松石，皆是秋香綠色，而非藏人評價更高的偏藍色松石。同樣地，八輩濟隴呼圖克圖進噶巴拉碗，乾隆皇帝收訖即把西藏進銀座、蓋換下，改換成造辦處製作，材質更珍貴，視覺上較為穩妥安定的八成金腰圓座配馬蹄形讚盤，與一般西藏常見的三角形座不同。而原入貢銀座，並未留下配其他噶巴拉碗，而是融化成造塔原料，暗示乾隆皇帝不認同此藏地品味。¹⁶⁶ 以上各例透露清宮對於西藏或前代風尚並非一味追求。的確，二、三、五輩達賴手執金剛鈴杵，乾隆皇帝應明瞭「噶爾馬時成造（ཀུན་ཀུན་）」指涉其為永樂朝明廷舊物，乾隆朝大批法鈴仿其造型、卻修改比例，並融合漢、藏傳統與最新西洋鑄銅配方，改良鈴聲，供奉皇家寺院之餘，亦分賞給班禪喇嘛、章嘉國師以及青、藏等地寺廟及大喇嘛；¹⁶⁷ 除了攏絡感情，何嘗未有展現大清帝國國富民強，工藝精益求精，遠邁前代與黃教故土西藏，為泱泱上國的雄心？本文拋磚引玉，就清宮所藏，進獻者相對明確的藏傳佛教入貢法器之探討，期望能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

〔後記〕 審查委員的各項重要建議，讓筆者受益匪淺，在此致上最高謝忱。

166 圖請見上海博物館編，《雪域藏珍》，頁153。從檔案資料觀察，乾隆四十多年以後，皇帝似不好藏地進貢，一般為骷髏三角座托座，而偏好上述束腰橢圓型座，請參以下兩例：「十一日，……交廟（鑲）銀裏（裡）嘎（噶）布拉碗一件，隨銀蓋、骷顛頭三角座，喇嘛堪布羅布藏達爾濟進，傳旨……照先廟（鑲）過嘎（噶）布拉碗銀裡、座、蓋款式花紋一樣，用此銀裡、蓋、座毀造分兩不足添用，外配銀半元（圓）下座一件，得時俱各鍍金。」（乾隆四十五年六月，〈記事錄〉）；「二十六日，……交廟（鑲）銀裡嘎（噶）布拉碗一件，係淳化軒蘊真齋經桌上供，丹錫勒□胡（呼）土（圖）克圖四樣字白綾籤，隨銀鍍金碗蓋一件、骷顛頭三角座一件……傳旨，著添配銀鍍金半元（圓）托座一件，……。」（乾隆五十八年正月），重點（底線）為作者所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金玉作〉。

167 謝繼勝主編，《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頁825。

表一：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號「餘1235-33」曼達盤相關資訊整理

編號	尺寸、重量	器內壁墨書與黃籤 (1兩=37.5g)
1 故雜1858	徑：14.9公分 重：190公克	墨書：「五刃 (兩) (187.5g)，連□環。」 黃籤：「嘉慶二十四年 (1819) 九月二十四日收，曹進喜交，金滿踏 (曼達) 一件，係銀圈環。連銀圈環，共重五兩。」 「金滿達一件，連□□共重五刃 (兩)，七成金之一。十七號之一。」
2 故雜1859	徑：14.8公分 重：176公克	墨書：「四刃六□ (錢)。(172.5g)」 黃籤：「嘉慶二十二年 (1817) 十二月二十五日收，曹進喜交，金滿 (曼) 達一件，係銀圈環。連環，共重四刃六錢，七成金。」
3 故雜1860	徑：13.6公分 重：189公克	墨書：「道光十八年 (1838) 十二月廿五日收，吳交，金滿 (曼) 達一件，連銀圈，共重五兩 (187.5g)。八成金。」 黃籤：「道光十八年 (1838) 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吳秉通交，八成金滿 (曼) 達一件。連銀圈，共重五兩。之三。」 「金曼達共壹個。之三。」 (原置故雜1862包) 白籤：「十八號，金滿 (曼) 達一件，八成金。連環，重五刃 (兩)。之三。」 (原置故雜1862)
4 故雜1861	徑：13.1公分 重：211公克	墨書：「五刃 (兩)。(187.5g)」 黃籤：「……進利益金造無量壽佛一尊，重二十二兩八錢。」 (有誤) 「同治十年 (1871) 五月初四日收，楊長春交，金滿 (曼) 達一件，重五刃 (兩)，七成金。之四。」 (原置故雜1859號) 「金滿 (曼) 達一件，七成金，重五刃。十七號之四。」 (原置故雜1858)
5 故雜1862	徑：12公分 重：161公克	墨書：「四刃 (兩)。(150g)」 黃籤：「光緒十年 (1884) 八月初五日收，總管王得福交，金滿 (曼) 達一件，重四兩，係三成金」。 「裏塘宣撫司德讓江錯，遣土舍、大、小頭人，呈進小金滿 (曼) 達壹箇。之五。」 「廿三號，金滿 (曼) 達一件，重四刃 (兩)，三成金□□。之五。」 (原置故雜1858) 白籤：「八十四號。」

表二：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號「餘1235-23」金輪相關資訊整理

編號	黃籤
1 故雜1846 高：32.4公分 重：2234克	「達賴喇嘛恭請聖安，呈進金法輪一個。」 「金輪一件，連膠胎，共重五十兩（1850克）。之一」 「金輪一件，重五十兩，連膠胎。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九日收，楊長春交。」
2 故雜1847 高：29.5公分 重：788公克 ¹⁶⁸	「金輪（輪）一件，重廿三兩，八成金。之二」 「道光二年（1822）二月二十五日收，曾進喜交，金輪（輪）一件，重廿三兩（862.5克），八成金。之三。」「二號」。
3 故雜1848 高：32.4公分 重：1029公克	「金輪（輪）一件，連木胎銀底座，共重廿八兩（1050克），輪係七成金。之三」 「金輪（輪）一件，連木胎艮（銀）底座，共重廿八兩，係七成金。道光二年（1822）四月初六收，曹進喜交。」「二十號」。
4 故雜1849 高：31.6公分 重：875克	「八成金鑲輪一件，銀托座破壞，共重二十三兩五錢（881克）。嘉慶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八日收，曹進喜交。」 「金鑲松石輪一件，銀托座破壞，共重廿三兩五分。之四」。 白籤：「十六號金鑲松石輪一件，銀托座破壞，共重廿三兩五分。」 底有墨書：「□三兩五分」。

168 另有脫落之膠底碎塊另包收貯，原重量應大於 788 克。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印度) 世親造，(唐) 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分別世品〉，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 29。
- (唐) 不空譯，《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 18。
- (唐) 不空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 19。
- (清)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
- (清)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2-1311。
- (清) 嵇璜、劉墉等奉敕撰，《清朝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清) 慶桂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覺羅勒德洪奉敕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賈楨奉敕修，《大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徐桐奉敕修，《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 崑岡等修、吳樹梅等纂，《大清會典》(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9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 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纂，《大清會典事例》(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 陳寶琛編纂，《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于敏中，《欽定日下舊聞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8。
- (清) 朱琰，《陶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11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珍藏歷世達賴喇嘛檔案薈萃》，北京：宗教文化，200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

出版社，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趙學毅等編，《清代以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與活佛轉世制度史料匯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

近代論著

土呷，〈昌都清代的四大呼圖克圖〉，《中國藏學》，2001年4期，頁39-51。

土呷，〈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與帕巴拉呼圖克圖名稱沿革考釋〉，《中國藏學》，2012年1期，頁81-85。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ཐུགས་ལྷན་ལྷོ་བཟང་ཚལ་གྱི་ཉི་མ་）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臺北：全佛文化，2004。

大理州文管所、下關市文化館，〈下關市佛圖塔實測和清理報告〉，《文物》，1986年7期，頁50-55。

上海博物館編，《雪域藏珍》，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

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力的崛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1。

王家鵬主編，《藏傳佛教造像》，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王家鵬，〈故宮藏傳金銅佛像類型分析〉，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十年論文選 1995-2004》，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395-409。

王家鵬，〈嘎布拉法器與乾隆皇帝的藏傳佛教信仰〉，收入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264-275。

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王開隊，〈康區藏傳佛教歷史地理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9。

王曉晶，《六世班禪進京史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王獻軍，〈西藏攝政制度述論〉，《西北史地》，1998年4期，頁76-78。

中國歷史博物館、西藏博物館編撰，《金色寶藏：西藏歷史文物選萃》，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中國陶瓷史編委會，《中國陶瓷史》，臺北：胡氏圖書出版社，1985。

-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 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等譯，《五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 石守謙、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 甲央、王明星主編，《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北京：朝華出版社，2000。
- 妙舟編著，《蒙藏佛教史》，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
- 朱家潛，〈故宮所藏明清兩代有關西藏的文物〉，《文物》，1959年7期，頁14-19。
- 朱曉明、索文清主編，《珍寶：歷代中央政府冊封達賴班禪歷史文物——歷世達賴班禪敬獻中央政府禮品精粹》，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
- 李中路，〈乾隆中期宮廷銅法鈴制作的創新與變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3期，頁122-128。
- 李中路，〈清宮藏傳佛教嘎布拉法器初探〉，《故宮學刊》，2014年1期，頁154-169。
- 李中路，〈清宮藏傳佛教法器供器概述〉，《文物世界》，2014年4期，頁31-34。
- 李玉珉、鍾子寅主編，《佛陀形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 李志武、劉勵中編，《塔爾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李德成，〈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述略〉，《中國藏學》，2011年S2期，頁64-79。
- 李鳳珍，〈試論清代西藏遞丹書克制〉，《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1期，頁39-48。
- 李鵬年，〈一人慶壽，舉國遭殃：略述慈禧的六旬慶典〉，《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頁32-40。
- 林歡，〈故宮博物院藏札卜札雅木器〉，《文物》，2015年4期，頁59-67。
- 金遠，〈中國古代金剛杵的發現及其源流考〉，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 東嘎·洛桑赤列（དང་དཀར་ལྷ་བཟང་འབྲིན་ལམ་），《東噶藏學大辭典》（དང་དཀར་ཚེག་མཚན་ཚེན་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
- 周浙昆等，〈西藏殼斗科的地理分布〉，《雲南植物研究》，1995年2期，頁144-152。
- 青海省博物館、青海民族博物館編著，《河湟藏珍：藏傳佛教文物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吳明娣，〈明清藏傳佛教法器鈴杵與漢藏藝術交流〉，《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6期，頁46-52。
- 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 吳偉蘋，〈淺析伊斯蘭玉石器的黃金與寶石鑲嵌〉，《故宮文物月刊》，334期，2011年1月，

頁 52-61。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92。

故宮博物院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故宮博物院編，《圖像與風格——故宮藏傳佛教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 Fletcher），〈1800 年前後清代的亞州腹地〉，收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劍橋中國史（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39-112。

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珐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柳森，〈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2。

袁凱錚，〈西藏東部藏傳佛教銅佛像製作工藝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0。

根旺，〈昌都絳巴林寺及帕巴拉佛世系源流簡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 6 期，頁 24-29。

索文清、郭美蘭主編，《清宮珍藏歷世班禪喇嘛檔案薈萃》，北京：宗教文化，2002。

桑丁才仁，〈略述清代西藏丹書克的有關問題〉，《中國藏學》，1997 年 1 期，頁 76-82。

秦鳳京，〈六世班禪覲見乾隆帝貢品史論〉，收入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310-322。

秦鳳京，〈六世班禪朝覲與清廷回賜文物存考〉，《歷史檔案》，2008 年 3 期，頁 68-77。

許曉東，〈清宮舊藏印度珍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 年 6 期，頁 13-33。

郭美蘭，〈康熙帝與多倫諾爾匯宗寺〉，《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6 卷 3 期，2004 年 5 月，頁 60-65。

梁豔，〈近二十年（1989-2009）昌都研究綜述〉，《中國藏學》，2010 年 3 期，頁 86-91、175。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

雲南省文化廳文物處等編，《大理崇聖寺三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馮林，〈清宮收藏的乾隆御制銘文古噶布拉碗〉，《文物春秋》，2000 年 2 期，頁 54-56。

馮明珠，〈宗喀巴·曼達·嘎布拉〉，《故宮文物月刊》，1983 年 2 期，頁 68-72。

馮明珠，〈殊勝因緣——來自達賴與班禪的獻禮〉，《故宮文物月刊》，329 期，2010 年 8 月，頁 14-29。

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張雙智、張羽新，〈論清代前後藏朝覲年班制度〉，《西藏研究》，2009 年 5 期，頁 16-24。

張雙智、張羽新，〈清代昌都強巴林寺帕克巴拉活佛朝覲年班制度〉，《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 卷 5 期，2010 年 9 月，頁 36-39。

- 張宏實、徐盼蘋編，《清宮秘藏：承德避暑山莊藏傳佛敕文物展圖錄》，臺北：觀想文物藝術有限公司，1999。
- 熊文彬，《元代藏漢藝術交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廖祖桂、陳慶英、周煒，〈論清朝金瓶掣籤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5期，頁165-179。
- 廖寶秀，《故宮藏瓷大系——宣德之部（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 蔡玫芬，〈丹舒克——故宮藏傳法器來源之一〉，《故宮文物月刊》，136期，1994年7月，頁4-25。
- 蔡玫芬，《皇權與佛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 鄧建新，《章嘉呼圖克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0。
- 歐立德（Elliott, Mark C.）著，青石譯，《乾隆帝（Emperor Qianlong）》，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
- 圖齊（Tucci, Giuseppe）著，耿昇譯，《西藏宗教之旅（The Religions of Tibet）》，北京：中國藏學，2005。
- 陳夏生，《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 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展》，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3。
- 陳楠，〈關於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補證〉，《中國藏學》，69期，2005年7月，頁33-39。
- 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陳蓮蒂，〈丹舒克釋義——藏文補釋〉，《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輯4，1994，頁202-210。
- 黃能馥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賴依縵，〈清乾隆御用金碗〉，《故宮文物月刊》，300期，2008年3月，頁140。
- 賴依縵，〈各族巧匠工藝結晶：乾隆9至11年製五方佛與救度佛母數珠箱〉，《九州集刊》，35期，2015，頁75-111。
- 賴依縵、張湘雯等，《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 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 謝繼勝主編，《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
-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 羅伯特·比爾（Beer, Robert）著，向紅茹譯，《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臺北：時報出版，2007。

- 立川武藏、賴富本宏編，《チベット密教》，東京：春秋社，1999。
- 賴富本宏、下泉全曉，《密教仏像図典》，京都：人文書院，1994。
- 関根俊一，《金剛鈴と金剛杵》，東京：至文堂，2011。
- Bazin, Nathalie, *Rituels Tibétains: visions secrètes du Ve Dalai Lama*, Paris: Editions de la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2002.
- Berger, Patricia Ann,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Bunker, Emma, "The Metallurgy of Personal Adornment," in Julia M. White and Bunker, Emma, *Adornment for Eternity: Status and Rank in Chinese Ornament*, Denver: Denver Art Museum, 1994.
- Clarke, John, *Jewellery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s*, New Delhi: Timeless Books, 2004.
- Clarke, John, "A Group of Sino-Mongolian Metalwork in the Tibetan Style," *Oriental Art*, Vol. 23, no. 5 (May 1922): 65-75.
- Clunas, Craig and Harrison-Hall, Jessica ed.,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4.
- Fairbank, John King,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Jackson, Anna et al. ed., *Maharaja: the Splendour of India's Royal Court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9.
- Jenkins, Marilyn and Keene, Manuel, *Islamic Jewelry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2.
- Keene, Manuel, *Treasury of the World: Jewel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the Mughal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1.
- Lo Bue, Erberto, "The Newar artists of the Nepal valley,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ir activities in neighbouring area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ibet II," *Oriental art*, Vol. 31 (3) (1985/86): 409.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Samoyault-Verlet, Colombe, et al., *Le Musée Chinois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Paris: Editions de la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1994.
- Sharma, Rita Devi and Varadarajan, M., *Handcrafted Indian Enamel Jewellery*,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4.
- Singer, Jane Casey, *Gold Jewelry from Tibet and Nepal*,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Trivedi, Madhu, *The Making of the Awadh Culture*, Delhi: Primus Books, 2010.

Welch, Stuart Cary, *India: Art and Culture, 1300-1900*,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5.

Buddhist Implements from the Qing Dynasty Presented as Tribute by Eminent Tibetan Figures: Exampl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ai, Iman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xhibi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court pursued a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Gelug Sect to appease the Mongols” and won over eminent figures in this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as a way to manage the various Mongol trib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as heads of the Gelug Sect in favored parts of Tibet would send clerics in alternating years to present tribute for the court. Over the year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ribute items accumulated at the Qing court, serving as testimony to the inclusion of Mongolian, Qinghai, and Tibetan areas into the empire by means of Tibetan Buddhism. Many of these items are also mentioned in Qing court records, the names of the presenter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Among them, Buddhist implements convey significan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irty-three Buddhist implemen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ith such clear records for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hey provide.

These Buddhist implemen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Gurkha artifact that was returned, were all presented as gifts by eminent figures in the Gelug Sect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on the occasion of paying tribute, birthdays, and deaths. They also relate to an imperial plaque presented to the Kumbum Monastery in Qinghai in 1748, the arrival of the Panchen Lama in the capital in 1780, the war with the Gurkhas in 1793, and the burial of the Daoguang emperor in 1852 at the imperial mausoleum. Except for a reliquary kept at Jehol, all were treasures stored in the Forbidden City.

Judg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label notes in four languages of the Qing court, craftsmanship and artistic styles, the date of production for these work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t the earliest and up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latest. The places of production for these Buddhist implements include tribute items from the Tibetan areas of Ü Tsang, Kham, and western Sichuan. With the exception of old Ming dynasty presents, all are products of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However, the Buddhist implements presented by lamas from Qinghai stationed in the capital include many of Chinese origin, such as those made in the capital. The art styles and aesthetic traditions of objects presented by eminent lama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reflect their respective variations. These Buddhist implements are exquisite works or have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hich the imperial workshops at the Qianlong court strived to imitate. Integrating them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latest techniques for completely new interpretations, they demonstrate the wealth and power of the Qing Empire and its imperial ambitions in the form of art.

Keywords: Qing dynasty, tributary system, Tibetan Buddhist art, religious implements, metalwar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1 清順治九年，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五世達賴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 清順治九年，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清順治九年，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側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清順治九年，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南瞻部洲與傘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清順治九年，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西牛貨洲與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清中期，西藏，銀壇城，拉穆吹忠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 清中期，西藏，銀壇城黃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 清中期，西藏，銀壇城側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清中期，西藏，白螺，拉穆吹忠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1 清光緒十年，康區，金曼達盤，理塘宣撫司等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2 清光緒十年，康區，金曼達盤黃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3 清嘉慶二十四年，金曼達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4 清嘉慶二十二年，金曼達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5 清道光十八年，金曼達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6 清同治十年，金曼達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1 清光緒二十年，銀壇城，六世土觀呼圖克圖等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2 清光緒二十年，銀壇城側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3 晚清，銀鑲珠寶靈芝如意附瑞獸雲鳳紋夔龍雙獅足銅座細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4 清，鑲金壇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5 清，鑲金壇城側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6 清光緒二十年，銀壇城盤面象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7 清，官窯，粉彩太平有象，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明初（傳永樂年間），金剛鈴杵，二、三、五輩達賴喇嘛手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2 明初，金剛鈴杵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3 明初，金剛鈴內藏文種子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1 清初，西藏，金剛鈴杵附鞞皮盒，達賴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2 清初，西藏，金剛鈴杵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3 清初，西藏，金剛鈴內藏文種子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1 清初，西藏，金剛鈴杵，班禪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2 清初，西藏，金剛鈴杵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3 清初，西藏，鈴內梵文種子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1 明初，西藏，金剛鈴，歷輩濟隴呼圖克圖所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2 明初，西藏，金剛杵，歷輩濟隴呼圖克圖所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3 明初，西藏，金剛鈴杵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清中期，西藏，金剛杵，拉穆吹忠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1 明末，青海，金剛鈴，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2 明末，青海，金剛鈴內梵文種子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3 明末，青海，金剛鈴內文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4 明末，青海，金剛杵，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1 清中期，金剛鈴，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2 清中期，金剛鈴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3 清中期，金剛鈴八大供養天女梵文種子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4 清中期，金剛杵，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1 明初（傳永樂年間），噶布拉手鼓，二、三、五輩達賴喇嘛手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2 明初，噶布拉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3 明初，噶布拉手鼓鼓面龍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4 明初，噶布拉手鼓鑲金腰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1 晚清，西藏，噶布拉手鼓，達賴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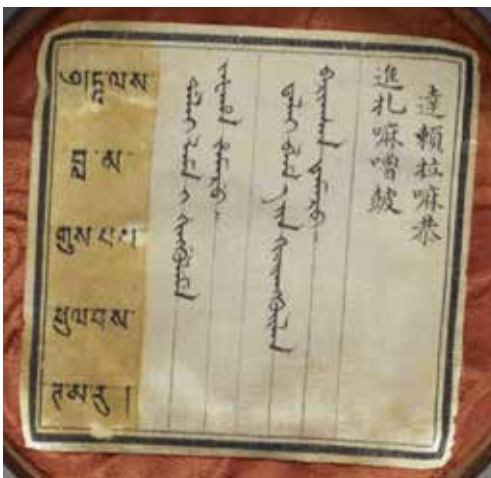


圖 14-2 晚清，西藏，噶布拉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1 清初，西藏，噶布拉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2 清初，西藏，噶布拉手鼓，班禪額爾德尼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3 清初，西藏，噶布拉手鼓鼓面龍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4 清初，西藏，噶布拉手鼓鑲金腰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1 清嘉慶九年，西藏，噶布拉手鼓，八世濟隴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2 清嘉慶九年，西藏，噶布拉手鼓流金腰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1 明末，青海，噶布拉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2 明末，青海，噶布拉手鼓捻金線腰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3 明末，青海，噶布拉手鼓，歷輩嘉呼圖克圖手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1 清中期，噶布拉手鼓，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2 清中期，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3 清中期，噶布拉手鼓鼓面龍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1 清乾隆五十八年，青玉手鼓鼓面龍紋與腰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2 清乾隆五十八年，青玉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3 清乾隆五十八年，青玉手鼓松石色瓷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1 晚清，噶布拉手鼓，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3 晚清，噶布拉手鼓鼓面龍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2 晚清，噶布拉手鼓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4 晚清，噶布拉手鼓腰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1 清同治五年，西藏，金鑲松石輪，十二世賴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2 清道光二年，西藏，金鑲松石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3 清道光二年，西藏，金鑲松石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4 清嘉慶十八年，西藏，金鑲松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1 清乾隆五十八年，古德噶布拉供碗，八世濟隴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2 清乾隆五十八年，古德噶布拉供碗托座底部滿、蒙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3 清乾隆五十八年，古德噶布拉供碗贊盤藏、漢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4 清乾隆五十八年，古德噶布拉供碗贊盤底部御製贊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1 十八世紀，南亞風格，銀胎內填瑠璃嵌寶蓋罐，清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2 十八世紀，南亞風格，銀胎內填瑠璃嵌寶蓋罐，附鞞皮盒白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清光緒二十一年，康區，刻花金碗，九世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1 清乾隆六十年，西藏，迎葉佛舍利、嘎烏、木盒，七世班禪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2 清乾隆六十年，西藏，嘎烏，七世班禪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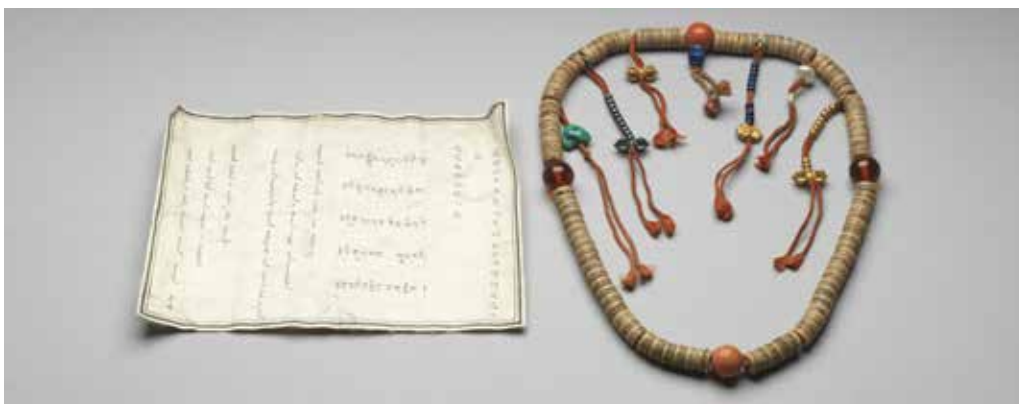


圖 26 清乾隆四十五年，西藏，噶布拉數珠，六世班禪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1 清乾隆四十五年，西藏，噶布拉數珠，六世班禪喇嘛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2 清乾隆四十五年，西藏，噶布拉數珠，六世班禪喇嘛進匣蓋黃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8 清乾隆元年，鳳眼菩提念珠，三世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清光緒十四年，菩提子念珠，六世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0 清光緒二十五年，白檀念珠，五世那木喀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 清乾隆十四年，青海，白檀木顯字枝葉，三世章嘉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1 清乾隆五十八年，西藏，蚌殼五佛冠，廓爾喀呈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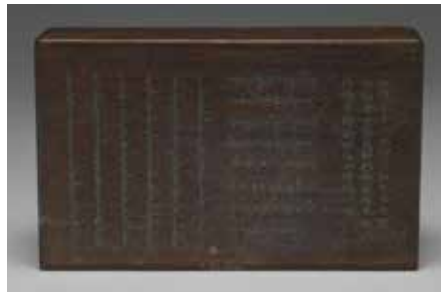


圖 32-2 清乾隆五十八年，蚌殼五佛冠附楠木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3-1 清咸豐二年，西藏，札古札雅木碗，九世濟隴呼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3-2 清咸豐二年，西藏，札古雅木碗黃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4 明宣德款，金剛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5 清乾隆款，金剛鈴，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6 明宣德款，嵌寶金剛鈴，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圖 37 清乾隆，玉質手鼓，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圖 38 清乾隆款，銅胎畫琺瑯罐細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 明永樂，青花龍紋天球瓶龍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1 清乾隆款，金鑲松石珊瑚曼達盤，楓丹白露宮中國館藏



圖 40-2 清乾隆款，金鑲松石珊瑚曼達盤「大清乾隆年敬造」款



圖 41 十八世紀，南亞風格，鑲金銀胎內填瑠璃嵌寶蓋罐細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2 約 1750 年，印度，蒙兀兒王朝，勒克瑙，鑲金銀胎藍色透明瑠璃嵌寶水煙罐組，杜哈伊
斯蘭藝術博物館藏



圖 43 約 1755 年，印度，蒙兀兒王朝，穆爾斯希達巴德，金嵌寶透明琺瑯頭巾冠飾，背面，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圖 45 1800-1850，印度，蒙兀兒王朝，齋浦爾，透明琺瑯神祇金頭巾冠飾，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圖 44: 十八至十九世紀，印度，蒙兀兒王朝，鑲金嵌寶玉臂釧，大都會博物館藏